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

——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二)

茅海建

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

正当光绪帝离开颐和园返回宫中时,颐和园内出现了重大事件,这就是慈禧太后决定回西苑。

西苑,又称三海,即今日北海和中南海,位于皇宫的西侧,是一处皇家园林。慈禧太后撤帘后,由宫中储秀宫搬到西苑的仪鸾殿,一般不住在宫中。自慈禧太后住颐和园后,每次回西苑都有其特殊的理由。光绪二十四年中,慈禧太后离开颐和园进城,共有6次。其中3次是去恭王府看病危的奕訢,两次当日返回颐和园,1次回西苑小住数日。另3次回西苑小住,其原因前已述及,即为咸丰帝的生日、光绪帝的生日、咸丰帝的忌日。也就是说,没有特殊的理由,慈禧太后不回西苑。

(一)杨崇伊的奏折与八月初三日晚慈禧太后决定明日回西苑
促发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的原因是御史杨崇伊的奏折。各位研究先进对此已有许多分析和评论,此处无须多言,而在此需要补证的是杨崇伊奏折进呈慈禧太后的时间。

最先肯定杨崇伊奏折在政变时作用的是吴相湘1957年的论

文,但将其时间错定为八月初二日,吴先生的证据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而其错误已由刘凤翰先生指出。1959年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收入杨崇伊的奏折,原件上写明为八月初三日。此后各位研究者对此并无异议。

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提出,杨崇伊奏折进呈慈禧太后的时间为八月初四日,其证据为由邓之诚记录的张尔田得知于张仲忻的说法。其中有一段称:“太后曰:‘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房先生又称此可得清宫档案的印证,由此而认为:“她上午接到密折,临时决定回宫,以至回来比较晚了。”

就我所见的档案来看,房先生的论断有误。尽管慈禧太后是八月初四日回西苑,但回西苑的决定却是八月初三日做出的。先看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

八月初三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初四日圣母皇太后还西苑,所用引导、跟随、关防官员人等照例派出,并所用牵骡甲人等照例预备。现用黄车一辆,备用黄车二辆,红车四辆,青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杨崇伊奏折,还留有其封套,其正面字样为“内一件”、“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背面为“谨”、“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跪折”(《军机处录副: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

房先生论文称:“按例,皇帝与太后有行动,总要在前一天发出通知,说明‘明日’将到何处,以便有关部门做准备,接下一日便记‘本日’到达该处,但初四日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初三日并未预发通知,仅在初四日的《早事档》等宫中档案上记有一条‘皇上本日办事后至瀛秀园门跪接皇太后’,说明太后是突然归来的。”查军机处《早事》、《早事档》,均不见有房先生所提此一条记载。其他宫中档案也无类似的文字记录。惟一的记录是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又,皇上今日还海。堂、司启帖站班速送讫。”(430/5—39/包号605)就我所见材料而言,房先生所提的这一文字记载见于《邸抄》。房先生所言可在清宫档案中得到印证一语,似不能得到档案材料的支持。从档案来看,房先生称皇帝、太后的行动通常在前一天发出通知,以便有关部门安排,也不完全正确,后将详述。又,下文所涉及的资料和研究论著的版本情况,若上文已说明过的,不另注出。

车三辆,引马四匹,格格等用大车三辆,苏拉八名,赏用蓝车二辆,于是日寅初在东宫门外预备。再妈妈、女子青车十七辆,照例在新宫门外预备。随侍总管、首领、太监等所用连鞍马开后。于八月初六日还颐和园。所传引导、跟随车辆于是日寅初在福华门外预备。

从此条记载可见,慈禧太后于八月初三日决定,初四日还西苑,初六日回顾和园。然回西苑的决定是在八月初三日何时做出的呢?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有记载:

戊刻,总管宋进禄传出,本月初四日皇太后回西苑,初六日还颐和园。引导、跟随杂录一件。初四日还西苑黄记载一件。已回文(琳)、崇(光)、世(续)大人,请示定世大人于初四日带豹尾枪。已给侍卫处、景运门、步军统领衙门文讫。并缮禀帖抄记载,专甲给启(秀)、立(山)堂及奎兰达送宅。堂主政、主政等值信均发往。杂录、黄记载均寄署入事。交抄草底粘档矣。奎、春主政告知,奉世大人谕:“著城内请示启、立堂,带初六日豹尾枪。”已给署中信照办矣。请准何位堂宪时,想著由署备文知照侍卫处、正黄旗护军营。引导、跟随报帖已粘档,并缮出手折二分,已分送世大人、敬事房讫。其初六日引导、跟随报帖,由署中攒要。

毓、梅主政告知,明日皇太后还西苑,大约皇上有跪接,本府衙门外即有站班之差,时刻太近,著约端十昌连夜进城赴启(秀)大人宅请示照拂带班。当约伊进城照办讫。

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由于时间紧迫,这一记载字迹潦草,不似平日之工整。

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 244/ 日 244。

由此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还宫的决定在戌时,即晚上7点至9点做出。这一时间还可得到另一条档案材料证明。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有记载:

补。初三日晚,报传初四日老佛爷由颐和园还海。(此笔未行车马人夫。私记。)

如果联系前引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这一天的演戏于“戌正二刻十分毕”,似乎可以认定,还宫的决定似在晚上8点半至9点做出。

根据以上档案,似乎还可做出推断,杨崇伊的奏折很可能是在光绪帝离开颐和园之后,也就是下午2点之后送达慈禧太后的。如光绪帝还在园中,那么,慈禧太后依其性格,似会当面向光绪帝发难,也会将其回宫的决定告诉光绪帝,也就是说,光绪帝会排定其次日在瀛秀门跪迎的日程事项。那么,至少在第二天,即初四日的军机处《早事》、《早事档》会有相应记录。与此道理相同,这一天的演戏可能会提前结束,不至于拖至“戌正二刻十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尚在园中时已经看到杨崇伊的奏折,并决定第二天回宫,却有意对光绪帝保密,以便第二天使光绪帝措手不及。不过,从前述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来看,慈禧太后有完全的控制光绪帝的权力与能力,她似乎没有必要这么做。

慈禧太后看到杨崇伊的奏折,为何没有当日回宫呢?这主要

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423/5—32—4/50。此一记载为八月初七日补记。

如果光绪帝八月初三日知道慈禧太后八月初四日回宫,此时军机虽散,当日也无法见军机,然其在第二天,即八月初四日早朝时,会有相应谕旨。而八月初四日军机处《早事》、《早事档》均无记载,似可以认为,光绪帝在初四日军机散值后,才得知慈禧太后回宫的消息。

是因为时间已晚,太后的仪制,使之出行成为很麻烦的事情。前引内务府《杂录档》中可见,慈禧太后回西苑所用的黄车、红车、青车、蓝车、大车达 32 辆,而随行的总管、首领、太监及所用的连鞍马匹数目为:

储秀宫总管、首领、太监等三百三十三名,用马三百三十三匹;茶房首领、太监、茶役等三十七名,用马三十七匹,大车四辆,车甲八名,苏拉二十名;膳房首领、太监、厨役等八十四名,用马八十四匹,大车十二辆,车甲二十四名,苏拉六十名;乾清宫总管一名,跟总管太监一名,用马二匹;奏事随侍处奏事太监一名,太监二名,用马三匹;懋勤殿首领、太监六名,用马六匹;匠役六名,用车三辆;敬事房首领、太监十一名,用马十一匹,写字人六名,用车三辆;尚乘轿首领、太监十七名,用马十七匹;营造司首领、太监四名,用马四匹;船坞首领、太监四十一名,用马四十一匹。

此次随行的太监、差役总数为 620 人,用马 528 匹,用车 22 辆。不仅如此,太后的出行还牵涉到内务府、侍卫处、护军营、步军统领衙门以及军机处,而从前引内务府《日记档》中可以看出,这些衙门的官吏为太后次日回西苑需在当晚紧急处理各类事务;此外,有关部门还需提前上报办理此事人员的名单。此次慈禧太后回西苑,我看见共 7 件报内务府堂的文件,这些文件格式相同,这里引一件以见一斑:“镶黄旗护军营为报堂事。由堂抄出于八月初四日皇太后由颐和园还海,本旗派出步引带豹尾枪护军统领顺保,参领荣秀,执豹尾枪护军校文绵、顺喜,护军二十三名。为此报堂。呈报护军

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所记甚草,且有多处脱落。此据《内务府来文:礼仪》(第 323 包)原件补正,该件的粘贴用纸上写“八月初三日”。

定连。八月初四日。”

前已提及,从内务府《杂录档》可见,光绪帝每次去颐和园,都是提前3天至8天通知预备车马,同时还通知从颐和园还宫的日期,而光绪帝的随行太监等人要大大少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出行,不仅是人员多,有时还带上戏班子。据升平署《日记档》,并参酌《内务府来文》可知,光绪二十四年慈禧太后出动时预告时间,一般为4至10天,最长为29天,最短为1天。此次八月初三日晚戌时决定次日一早回西苑,对慈禧太后而言,已是相当急迫,由此来不及通知升平署,因而在慈禧太后出行送驾、接驾时,并无升平署中和乐的演奏。

尽管按慈禧太后的出行之惯例,八月初三日晚决定次日回西

《内务府来文 巡幸及行宫》,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至十二月,441/5—50—2/16/3136。由于时间紧迫,各机构都是于八月初四日临行前才报来名单。以往此类名单往往提前数天便报到内务府。如六月初八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西苑,报内务府堂官文件的时间皆为初三日:“都虞司为报堂事。六月初八日皇太后还西苑,著派前引副参领恒贵、满长,骁骑校永福、兴元充当……六月初三日。”“关防衙门为六月初八日皇太后前往南海……派出前引内管领椿寿、钟吉,副管领继彬、广裕。为此报堂。六月初三日。”“正黄旗护军营为报堂事。于本月初八日皇太后还西苑……派出执带豹尾枪护军统领通庆,印务参领溥炳,护军校忠海、德志,笔帖式广存,护军二十八名……六月初三日。”“镶黄旗护军营为报堂事。由堂抄出本月初八日寅初,皇太后由颐和园还海,本旗派出步引带豹尾枪护军统领顺保,参领荣秀,执豹尾枪护军校顺喜、文绵,护军二十三名……六月初三日。”(《内务府来文 礼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至七月)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慈禧太后由西苑回颐和园,提前29天;闰三月十三日由颐和园回西苑以探病中的恭亲王,提前2天;四月初十日去恭王府,提前1天;五月十三日去恭王府,提前4天;六月初八日由颐和园回西苑,提前6天;六月二十一日由颐和园回西苑,提前10天;七月十八日由颐和园回西苑,提前8天。

据清代典制,慈禧太后离开颐和园时,在绣漪桥随墙门内,应有中和乐演奏“德胜乐”,而到达西苑时,在福华门外,应有中和乐演奏“德胜乐”。当时升平署人员大多随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须先行派员去西苑,故来不及准备。

苑已是相当仓促的紧急措施,但能将此事放到第二天进行,也说明慈禧太后感到并无燃眉之急。若真有关系其权力和命运的大事,她也会打破一切常规,当晚回西苑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继续叙评。

就在慈禧太后决定第二天回西苑时,康有为及其党人也在京城开始发动,此即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与此事相关的史料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康有为的《自编年谱》、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杨天石先生、汤志钧先生所发现的毕永年的《诡谋彙纪》。就人物关系而言,他们都可谓是当事人。对于这些史料,杨天石先生1985年、1998年论文、戴逸先生1999年论文、骆宝善先生1999年论文、房德邻先生2001年论文、郭卫东先生2002年论文都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尽管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而在此处需要补证者有二。其一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时间。袁世凯称,谭嗣同来访时,其正在“秉烛拟疏稿”,离去时为“夜深”。康有为未称谭嗣同往访的时间,仅称梁启超“至金顶庙容纯斋处,候消息”。从其叙事顺序而言,也难判断其准确时间。又称其本人“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知袁不能举兵”。从“候”字来看,似乎康有为到达金顶庙时,谭嗣同尚未回来。梁启超称:“初三日夕,君径造访袁所法华寺”;又称谭离去时为“初三日夜漏三下矣”。毕永年未称具体时间,只是称初三日,“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此时康有为主要居住处为宣武门外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和东城金顶庙,袁世

《戊戌变法》第1册,第550—552页。

《戊戌变法》第4册,第161页。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8页。

《诡谋直纪》,转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凯当时在京城内的居所为法华寺。据周育民先生的考证,金顶庙位于东华门外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是一关帝庙。袁所住的法华寺位于东城报房胡同。从以上记载可见,当时康有为及其党人的主要商谈地点在宣武门外南海会馆,谭嗣同访袁时,梁启超至金顶庙等候消息,康有为至“子刻”也至金顶庙等候消息。而烧酒胡同的金顶庙到报房胡同的法华寺,两地的步行时间大约10至15分钟。也可以说,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所记录的时间会有不超过15分钟的差别,以至可以忽略不计。而梁启超与袁世凯记录时间恰是完全相同,即谭嗣同造访时间为傍晚,离去时间为深夜。康有为的记录证实了谭嗣同回到金顶庙的时间,而毕永年的记录证实了谭、康、梁三人当晚的行踪。如果对照前述杨崇伊奏折进呈慈禧太后的时间及慈禧太后下令回宫的时间,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慈禧太后八月初三日晚决定回西苑一事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并无关系。

其二是光绪帝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发动是否知情。尽管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或明示或暗示了谭嗣同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的管道,康有为更称,谭在发动后光绪帝有配合的行动。一些研究者也相信了这些说法,将之写入论文。对此,房德邻先生1988年的论文进行了反驳。对于房先生的基本论点我是同意的,其分析中的最重要一点是,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光绪帝自七月二十日之后没有召见过谭嗣同。如果说,康有为及其党人欲与光绪帝通消息,最佳机会是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召见林旭时,然康有为自称其是八月初三日看到密诏后才决定发动,时间上是

周育民:《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法华古寺风云录》,见林克光等主编《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493、409—419页。

本文初稿完成后,我看到郭卫东先生2002年论文对此有同样的分析。

错后的。尽管房先生称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回宫后光绪帝即处于严密监视之下,尚有可商议之处(后将详述),然从八月初三日光绪帝回宫至初五日,我所看到的材料均支持房先生的论点,即在此期间光绪帝同康有为及其党人并无直接的联络。谭嗣同若要与光绪帝通消息,只有一个办法,即前引杨锐私信中所指出的,“据实条陈,由军机大臣呈递”,而此类绝密事宜,谭嗣同似不便以书信的方式与光绪帝联络,更何况袁并未做出明确肯定的承诺。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八月初三日晚慈禧太后在杨崇伊等人策谋下的发动和康有为、谭嗣同策谋袁世凯的发动,光绪帝都是不知情的。他刚从颐和园回来,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平静夜了。然而,对发动的双方来说,这一夜却是不平静的。

(二)伊藤博文的觐见

诸位研究先进已经指出,慈禧太后回西苑是由杨崇伊的奏折所引发。然慈禧太后回西苑的目的为何?

由此再检视杨崇伊的奏折。杨折中关于请慈禧太后立即训政的主要理由涉及4个人:第一个是革员文廷式,其罪名是甲午昌言用兵,以致割地偿款,并与康有为、孙文相勾结;第二个是康有为,其罪名是组织强学会、大同学会,在京讲学,变更成法,并与文廷式、孙文相勾结;第三个是孙文,其罪名是与文廷式、康有为相勾结;第四个是伊藤博文。其中文廷式已是革员,掀不起大的风浪;康有为据八月初二日的谕旨,已被逐往上海;孙文早被清朝通缉,亦已逃往海外。惟一具有现实威胁性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对此,杨折称:

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在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

下,不啻拱手让人。

也有一些研究先进据此而指出,慈禧太后回西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八月初五日光绪帝将召见伊藤博文。

这一论点可以得到前引内务府各档案的支持。前引档案已经说明,慈禧太后八月初三日晚的决定是八月初四日回西苑,初六日回顾和园。这一决定的意义就在于,其目的是针对伊藤博文而不是针对光绪帝的。因为慈禧太后在西苑的时间只有八月初四的晚上,初五日一天,初六日早晨。如果是针对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就不会这么快回顾和园,必须始终与光绪帝同住在一处。慈禧太后临行时可能还不知道光绪帝决定于八月初十日去颐和园,十七日还宫;但即使知道,八月初六日至初十日,光绪帝仍有5天单独在宫中行使皇帝权力的时间。如果再进一步的设想,称慈禧太后初六日回顾和园的决定,是对光绪帝的迷惑,我认为也不太像。这里可以提出两条证据:其一是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离开颐和园时,仍不忘由敬事房传其旨意给内务府升平署:“十四日、十五日、十六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对此有很深入的分析。王树卿先生1990年著作称:“慈禧太后早在八月初四日就从颐和园乐寿堂回到了西苑仪鸾殿,因为八月初五日的早晨她要‘来宫祀蚕神’……”王先生的这一说法不知有何根据。清代祀蚕神应在四月,主祀的应为皇后,有如皇帝亲耕礼。光绪二十四年的祀蚕礼于四月二十五日进行,主祀者为皇后与瑾妃。内务府档案中有详细的记录:“四月二十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二十五日皇后乘轿前往南海去……是日并往先蚕坛去……”“四月二十五日辰初总管一名请皇后从宜芸馆步行至会寿殿院内,乘轿出东宫门……已正二刻,总管一名请皇后乘轿至福华门外,鸾仪卫校尉接请进承光右门至蚕坛,午初初刻缣丝礼毕,总管一名引皇后步行到蚕坛东门外,乘轿出承光右门……至乐寿堂诣圣母皇太后前,恭行献蚕,道大喜。”“四月二十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二十五日瑾妃乘轿前往先蚕坛去……”“四月二十五日已正二刻,瑾妃从本宫乘轿由琼苑东门……至蚕坛等候。午初初刻,瑾妃随从缣丝礼毕。瑾妃步行至蚕坛东门栏外,乘轿……住本宫。”(《内务府来文 礼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至七月,441/5—509—1/N/第322包)

日颐乐殿伺候戏。”颐乐殿为颐和园中的演戏场所。慈禧太后这一位戏迷,临行前还在颐和园为其准备了3天的中秋节大戏。后来的时局变化使这几天演戏的时间和地点,一变再变,显得十分麻烦。其二是内务府已经安排初六日慈禧太后回颐和园的各类事务(后将详述)。

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一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对此,我已写《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态度的调适》一文,另行发表,此处不再详论。但在这里可以简要说明的是,根据当时的清朝仪制,光绪帝只接见奉有国书或国电的外国正式使节,而伊藤属“自行游历”的没有官方使命的外国退位政治家,更何况也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伊藤本人提出过觐见光绪帝的要求。

光绪帝何时决定召见伊藤博文,现有材料不是非常清楚。正式的决定似乎在八月初三日做出。该日总理衙门片行内务府:

总理衙门为片行事。准军机处知会,本月初五日皇上御勤政殿,接见日本侯爵伊藤博文,相应知照贵衙门,于是日敬谨预备可也。

更具体的时间似在该日光绪帝从颐和园回宫前,该日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记:

毓、梅主政告知,现闻得本月初五日外国使臣在海内勤政殿觐见,本府衙门外有站来回班。已请示定,是日世大人带班等专甲进城,将第三班站班。堂谕:赶紧要来备批等语。当派都甲将堂谕已取,交子嘉、富东手矣。

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内务府来文 外交》,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441/5—50—1/N/第1715包。

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244/日244。

此记载表明,初五日光绪帝从宫中养心殿去西苑勤政殿,内务府官员站班等有关事项,是由颐和园这边安排的。次日总理衙门将此时间通知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然而,新任总理衙门章京、参加接待事务的郑孝胥却早在八月初一日便听说,“伊藤于初五日召见”。此中的细节现仍不能一一确定。但不管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的时间有无请示,慈禧太后若想知道,完全可以从其亲信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处得到准确的消息。由此似可以认为,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西苑时,已知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的时间为初五日中午。

康有为及其党人对于此次伊藤博文的访华,似有着一个完整的计划。这里可以排出一份时间表。其一,伊藤博文到北京后,康有为曾于八月初三日下午拜访过伊藤博文,两人有过较长时间的交谈。其二,八月初五日,御史杨深秀奏称:“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为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其三,八月初六日,御史宋伯鲁奏称:“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

《总理衙门致林权助》(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松本记录),6-4-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郑称其消息来自陶杏南,而陶氏当时任日文翻译,随伊藤来到北京。陶氏还称,“将上条陈”,其主语是陶本人,或总理衙门,甚至伊藤?不解其意。又,查七月三十日军机处《早事档》,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封奏一件,奉旨‘留’”。再查该日《随手登记档》,不见该封奏的记录。不知该折的内容,也不知为何《随手登记档》没有记录。

转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19—22页。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页。孔祥吉先生认为该折由康有为代拟。

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我以为,由此时间表似可大胆地推论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计谋:先由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日出面探寻伊藤博文的基本态度;然后次日即八月初四日由杨深秀出奏,该折当于初五日早朝时呈递到光绪帝之手,而中午即是伊藤博文觐见之时,使光绪帝在此时有印象,以盼其有所行动;又次日由宋伯鲁再出奏,因觐见已经完成,光绪帝不太可能再见伊藤,故请李鸿章再与之交涉,同时推出康有为。然而,康有为及其党人之精心设计,虽不为慈禧太后所预知,但在行动上却被慈禧太后占了先机。

慈禧太后极具政治敏感,对权力尤其丝毫不放松。就笔者所见,她在由颐和园回西苑前,所得到的有关伊藤博文的正式材料为以下3件:其一是刑部主事洪汝冲的奏折。该折提出了“迁都”、“借才”、“联邦”三策,其中“借才”一策称:

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觐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而中日之邦交益固。否则无论中国人才,万难收效旦夕。即有一二新进有志之士,亦未必不见嫉老成,事多掣肘,及至身败名裂,而国事已无可挽回。伊藤以敌国旧相,成绩昭然,信任既专,威望自重,无所惮于变革,无所用其排挤,即与欧西交涉,亦当刮目相看,庶阴谋藉以稍戢,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此借才之不可缓者。

据《随手登记档》,洪汝冲奏折于七月二十四日由刑部代奏,又据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页。孔祥吉先生认为该折由康有为代拟。

《戊戌变法》第2册,第364—365页。孔祥吉先生认为该折由康有为代拟。另外,洪汝冲原折在档案中尚未检出,这里所引系《戊戌变法》编者辑自《皇朝蓄艾文编》。

《上谕档》,该折奉旨“留中”,并于当日进呈慈禧太后。洪汝冲的激烈言论,给慈禧太后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在政变后,对洪有所追查。其二是八月初一日军机处将总理衙门抄录的与日本伊藤博文问答节略呈送慈禧太后。其三是前军机章京新任江苏松江知府濮子潼八月初三日的奏折:

闻伊藤现因游历来都,拟请皇上优以礼貌,饬总理王、大臣密问彼国维新诸政次第如何而分?款项从何而集?条举件系,朗若列眉,然后参以中国情形,拟定办法。上取进止,明诏中外,遵照奉行。

该折于当日呈送慈禧太后。

杨崇伊的奏折进到慈禧太后前时,现有的材料尚不能确定有

《戊戌变法》第2册收入该折时,时间误为“六月”,致使一些研究者在时间上有误。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八月十七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有一奏片,称“遵查李岳瑞、洪汝冲并无请假离署”。此时正是慈禧太后追查王照之时,很可能王文韶、廖寿恒在上朝时,奉慈禧太后命令追查李岳瑞、洪汝冲,故王、廖有此奏片。据军机处《上谕档》、《交片档》,同日发下交片谕旨:交总理衙门、刑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李岳瑞、刑部主事洪汝冲均著该衙门堂官随时察看。”李岳瑞于七月二十五日经总理衙门代奏条陈,奉旨“留中”,七月二十六日再由总理衙门代递条陈一折一片,奉旨“应归入张元济条陈核办”,均于当日上呈慈禧太后。由于李岳瑞以上各条陈均未见,不知是否与伊藤博文有关连。

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该记录原文是“谨将总理衙门抄录与日本伊藤博文问答节略恭呈慈览。谨奏。”而在第二天,该档又有完全同样的记载。再查《随手登记档》,八月初一日的记载是“伊藤约答节略恭呈慈览”;八月初二日的记载是“晤伊藤博文问答照录呈览”。按照《随手登记档》,即该节略先呈慈禧太后,次日再呈光绪帝。此与当时的政治处理原则不符。另一可能是,当时有两份不同的节略,故先后两次上呈。总理衙门与伊藤博文的会谈记录,可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14—16页。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3/37;《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何人在场。但若慈禧太后有所垂询,那么任何一个说实话的大臣都会陈明,此时的京城已经弥漫着伊藤博文将被留下重用的传言。各位研究先进对于此时的传言多有叙及,可不再评论,以下仅就档案中的奏折情况做一补证。现存的奏折涉及重用客卿或反对此事者,有以下几件:其一,工部营缮司郎中福润奏称:“现闻伊藤博文游历已至天津,如到京时,可否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大学堂管学大臣、农工商总局总办前往面询明治维新一切学堂、矿务、农工商局创办规模,即将接谈得失各情,详晰缮单,恭呈御览,以备采择。”该折上注明是八月初三日,初四日由工部代奏,该折未呈慈禧太后。其二,户部学习主事陈星庚提出“联与国以借人才”,但他主张“商请英国政治家数人,聘订来华,以备咨询而资辅理”。该折上注明是八月初三日,初四日由户部代奏。该折未呈慈禧太后。其三,翰林院编修黄曾源提出“借才非现在所宜”。其在奏折中称:“窃臣风闻,道路纷纷,金谓新政需才,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对此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借用伊藤必然受到俄国的反对,“是伊藤之益新政者不可知,而害于邦交者已有不可胜言者矣”。与该折同时并上两片:“伊藤不宜优礼”、“和俄以疑英日”。黄曾源的奏折上注明为八月初四日,同日由翰林院代递,当日奉旨“存”,当日进呈慈禧太后。其四,候选郎中陈时政奏请重用伊藤博文,称:“伊藤既为日本维新之臣,必能识新政之纲领,知变法之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3/54;《随手登记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3/53;《随手登记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另参见户部八月初四日奏折。陈星庚曾作为薛福成的随员,出使英、法等国。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4/7;《随手登记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本原,朝廷用人如不及,莫于召对时,体察其情,如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著其参预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也。”该折上注明为八月初四日,初五日由都察院代递。该折未呈慈禧太后。其五,兵部员外郎祁师曾上奏主张留用伊藤博文。该折称:“应请我皇上博采慎选日、美素有名望之大臣,礼隆高爵延用一二人或另建议事处,或令在总理衙门,遇有中外大事,悉公照公法辩论,主持清议。”“日本退位大臣侯爵伊藤博文此次来华游历,我皇上宜亲考其联日美、阻俄法之道……可否皇上召见数次,察其可用与否,立予清职,使有议事之权,无行政之权。”该折上注明为八月初六日,同日由兵部代奏,此日慈禧太后已临朝。这些只是奏折的情况,而每一件奏折的背后很可能又有众多的故事。政变后,反对康有为等人的前户部主事缪润绂将伊藤博文来华,称为康有为、张荫桓密定召采,并伴有孙文的密谋。由此可以大体推测当时传言的广泛和失真程度。

由此而产生一个问题,光绪帝留伊藤博文作为清朝的顾问当时有无可能性?对此可先看看已经进行的事项。首先是聘请日本技术专家。七月初二日,总理衙门大臣兼任矿务总局大臣王文韶、

陈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97页,原折藏《军机处录副·专题补遗·戊戌变法》;上奏事见都察院奏《代奏长庆等条陈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也藏于《军机处录副·光绪朝·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并可参见《随手登记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孔祥吉先生1983年论文称陈时政奏折上于八月初三日,并“当天即由军机大臣随同其他折件‘恭呈慈览’”。孔先生称其资料来源为:“一史馆:陈时政:《条陈时政便宜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一史馆:《随手登记档》。”为此再查相关档案,皆非孔先生所言,当其有误。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5/8。又可参见兵部奏,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5/81;《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2、464页。

张荫桓发电清朝驻日本公使裕庚：

伊藤节略所言，弥通矿学之堀田连太郎，现矿务总局拟聘请来华，咨访一切，以备筹勘矿务。至应如何延订，及能否即来之处，统希妥酌，询明电复。韶。桓。

此处的伊藤节略，是指伊藤博文面交裕庚的有关日本的矿章，聘用堀田一事因其当选议员而后有变故。此事说明当时清朝政府准备聘请日本高级技术人才。其次是聘请日本职业外交官。八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收到电报：

加藤以既就中国聘请，将离本职，倘有改易，恐两误。愿在此定合同。有草底交来，所列岁金、年限、盘费、职业等条，称皆蒙钧署与林使订明之件。是否可以照办，请速示遵。唐。蒸。
此处的加藤，即加藤增雄，时任日本驻韩国公使；此处的林使，即林权助，日本驻俄国公使，此时代理日本驻清朝公使；此处的唐，即唐绍仪，时任清朝驻韩国总领事。这份电报透露出，当时总理衙门

军机处《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

六月二十六日总理衙门收到驻日公使裕庚的电报：“漾电遵。铁路章前岁已译上，存署，无另章。矿章有伊藤面交节略，成书图说亦于正月十六日呈署。节略所言，至矣，尽矣。便览一书，似专指日矿，译亦无用……崛（堀）田乃第一手，伊畏（藤）所力保，前已在华，似可令到京面加询防（访），较真切。伊藤亦必面说。”七月初四日再收裕庚电：“冬电遵。届（堀）田在西京新派议议院员，须候大畏（日相大隈重信）妥商，畏现下谕订初十，高明电陈。”七月初九日再收裕庚电：“所聘之堀田充议员，恐未能来。现已与农部妥商，能来固好，否则必挑一熟手相代，总对得住中国。五六日再陈大隈。”（《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由此可见，聘用堀田与伊藤博文甚有关系。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此电的标题称“收出使裕大臣电”，即指收到驻日本公使裕庚的电报，落款却为唐。根据有线电报的技术，很可能唐绍仪的电报也由日本转来。该电注明“蒸”，即初十日，收到日期为十一日，也说明电报经过多次中转。当然可能是标题抄错了。总理衙门清档是民国年间外交部的抄档。

已与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有过很具体的商谈,聘请日本高级外交官。也就是说,除了技术人才,此时已经考虑聘请政治人才了。但是,从清朝的政治权力结构来看,难有相应的政治空间以留聘伊藤博文,前引各留用伊藤的奏折,也只是称用高爵厚禄留伊藤以备随时咨询。然清朝当时无法设立可以留用伊藤的政治职位,这不过是我今天的一种判断,而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光绪帝会否因其不在而如七月十九日罢免礼部六堂官、二十日任命军机四章京那样,做出一些她无法接受又无权否决的“荒唐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直到此时,应当说,慈禧太后看到的只有一些痕迹,而无任何证据。但杨崇伊奏折称“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很是有煽动性,在她与光绪帝之间已陷于紧张状态的关系中,点着了吱吱作响的引火绳。

然而,在八月初三日晚至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并没有显出焦虑和不安。八月初三日晚,内务府所拟的第二天行程是:

八月初四日,圣母皇太后在乐寿堂进早膳毕,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水木自亲码头乘船至广源闸西码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东码头,下轿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轿进西直门、西安门,由西三座门进福华门,由瀛秀园门还仪鸾殿。

在此期间,司员士民的奏折也建议在总理衙门设客卿。户部候补主事聂兴圻在七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称:“设客卿以奔走外臣也。自来列国相持,楚才晋用,原不为嫌,但视用者专与不专耳。方今中国虽有维新任事之人,以视欧美东洋,尚瞠乎其。拟请飭下总理衙门,议设文武客卿等级,以待外洋有志欲强我中国者。并知会欧美各国,其有贤能愿客仕我中国者,即以客卿之位尊显之。如此,则彼为我尽才能,斯新政更易成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3页)又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该折于七月二十八日由户部代递。

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沿途两次休息,两次换船,三次换轿,并在途中去万寿寺烧香。^①慈禧太后这一行程比光绪帝从颐和园还宫一路坐轿,要舒适得多,悠闲得多,花费的时间也多得多。今天还找不到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慈禧太后此行时的心情,但从前引内务府《杂录档》的一段史料可以看出,尽管所用的车马都在寅初,即凌晨3时分别在东宫门、新宫门准备完毕,但她回到西苑却已很晚。《清代起居注册》称,光绪帝于“申刻”(下午3至5时)在瀛秀园门外跪接慈禧太后。^②看起来她并不着急,显得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对于年轻的光绪帝,她有绝对的操纵和控制的能力。

(三)八月初四日光绪帝移居瀛台非为囚禁

慈禧太后回到西苑的时间为初四日的“申刻”,光绪帝很晚才得到庆亲王奕劻报来的消息,依例在瀛秀园门外跪接。^③从内务府档案中可以看出,尽管这一时间对仪制而言过于紧迫,但还没有出差错。内务府《日记档》(署中)称:“今日本府衙门外站班无误。

① 如果与以往慈禧太后的行程相比,只是少了在御座房用早膳,这也是因为决定仓促而不及准备。其余的一切与以往完全相同。又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记:“八月初四日询得今日皇太后在乐寿堂用早膳毕,至万寿寺拈香,至倚虹堂少坐,进西直门、西安门、西三门还海。”奉宸苑即为管理西苑等处的机构,此记载很有可能不是文件的转抄,而是事后的记录。

② 《清代起居注册》第61册,第31221页。

③ 我在前面已说明,由于军机处《早事》中没有跪接的记载,由此可以证明直到此日军机处散值时,光绪帝尚不知道慈禧太后的到来。此处再补一材料,当日军机处《早事》记光绪帝“召见孙中堂、张荫桓、袁祖礼、军机”,而当日宫中《召见单》(京官)则记:“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庆亲王奕劻,张荫桓,户部左侍郎”,该《召见单》(外官)记:“袁祖礼,湖北候补游击”。两者相较,增加了庆亲王奕劻。此可证明,光绪帝召见奕劻并不是事先的安排,且召见时间也在军机处散值之后。很可能是由庆亲王奕劻向光绪帝报告慈禧太后当日到来的消息。同样的情况还出现过两次,即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宫中《召见单》记有庆亲王奕劻,军机处《早事》中未记。

已向启堂(启秀)发禀。”这一例外的记录,可见办成此事正属例外。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见面时,双方有何争论,档案中自然没有任何记录,而私家记载的绘声绘色反给人留下不实的印象。根据《清朝起居注册》,光绪帝当晚由养心殿移住西苑瀛台涵元殿。

一些研究者认为,光绪帝从养心殿移居涵元殿是百日维新终结的标志。孔祥吉先生1983年论文以多种档案证明了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起居注》是一个不可靠的抄本,同时认为“慈禧等人于八月初四日晚,由颐和园赶回皇宫之后,立即对光绪帝采取了监禁措施”;并称“众所周知,涵元殿地处瀛台,四面环水,是政变后囚禁光绪之处所”。孔先生由此认为八月初四日是戊戌政变爆发的时间。对于这一说法,我以为还是可以再讨论的。

首先瀛台是否是“四面环水”?为此查证乾隆年间敕修《国朝宫史》称:

由仁曜门而南,渡桥为瀛台。平堤石阑,历级而登,有阁向北,圣祖仁皇帝御笔榜曰“翔鸾阁”……由阁而南为涵元门,门内东向为庆云殿,西向为景星殿,正中南向为涵元殿,御笔匾曰:“天心月肋”……自翔鸾阁至迎薰亭,统名“瀛台”,三面临水。

仁曜门是勤政殿后侧南向之门,瀛台距皇帝的办公区勤政殿很近,故康熙帝之后,皇帝在西苑时常常住在瀛台涵元殿。而从仁曜门

内务府《日记档》(署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405/5—14/杂记类243。

在关于戊戌政变的时间上,孔祥吉先生的说法似小有矛盾之处。其在1983年的论文中称:“事实上光绪在政变之前,也常常在涵元殿驻蹕;政变后也并非不移居他处,这些在清宫档案中均言之历历,不能将光绪移居瀛台的时间,作为政变的标志。”同时,他又认为,光绪帝移居瀛台即被幽禁,也即是八月初四发生政变。关于他的这一论点,并可参见其作《建国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述评》,《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405—407页。

到瀛台之间有一桥相通,以使住在涵元殿的皇帝能方便地往来其办公区勤政殿。该书有大量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关于咏瀛台的诗。其中乾隆帝《御制瀛台记》称:“自勤政殿南行,石堤为数十步,阶而升,有楼门向北,匾曰:‘瀛台门’……盖瀛台惟北通一堤,其三面皆临太液”。太液即西苑各海之称。^①嘉庆年间敕修的《国朝宫史续编》,关于瀛台的描绘与前完全相同,再次肯定了瀛台当时三面环水。^②光绪十五年所出版的《顺天府志》亦称:“(勤政)殿后为仁曜门,门南过桥为瀛台,平堤石栏,拾级而登,正中南向为翔鸾阁……台为榷台陂旧址,即明时所谓南台者。国朝顺治年间,稍加修葺,圣祖时驾幸瀛台,常于此听政……台南为迎薰亭,自翔鸾阁至此,统称瀛台,三面环水。”^③曾任翰林院编修、云贵总督的吴振械在《养吉斋丛录》中称:“瀛台在勤政殿南,为榷台陂旧址,即明所谓南台者。顺治间加以修葺,康熙间驻西苑,于此日讲,今匾额则乾隆年间御书也。台三面临水。”^④从以上所引材料可见,瀛台本为三面临水,直至光绪年间一直有桥相通,只不过其桥很可能是“石堤”,大约有“数十步”。

其次是光绪帝此时移居瀛台是否即为监禁?前已叙及,按照当时的惯例,慈禧太后回城后住在西苑仪鸾殿,为了请安等事的方便,光绪帝也移住西苑瀛台。^⑤下以光绪二十四年为例,可以证明

- ①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上册,左步青标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302页。
- ②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下册,左步青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27—535页。书中有大量咏瀛台的诗亦可为证。
- ③ 周家楣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第1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 ④ 吴振械:《养吉斋丛录》,鲍正鹄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 ⑤ 按照清代仪制,皇帝从官中到西苑,或从西苑到官中,侍卫处、内务府等机构有一系列的引导、站班、护卫等事务,须得提前通知以准备,并定下相当严格的时间表。可能是此种不方便,使光绪帝也同住西苑。

光绪帝此时移住西苑瀛台只不过是按例行事。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光绪帝住在宫中养心殿,十六日住在天坛斋宫,十七日起至三十日住在西苑瀛台涵元殿;二月初一日至初三日住在宫中养心殿,初四日至十六日住在瀛台涵元殿。在此期间,慈禧太后一直住在西苑仪鸾殿。而光绪帝正月初一日至十六日住在宫中养心殿有其特殊的理由。新正在奉先殿、堂子、慈宁门、乾清宫、大高玄殿有一系列的礼仪活动;初二日在坤宁宫有进肉之仪;初三日须在寿皇殿行礼;初七日至初九日斋戒三天,初十日祭祖在太庙行礼;十二日在大高玄殿行礼,以求雨雪;十三日在乾清宫赐近支宗藩宴;十四日起又开始斋戒三天;十五日在大高玄殿拈香,在寿皇殿行礼;十六日在太和殿看祝版,然后移居斋宫。当他完成天坛的祈谷后,于十七日立即移居瀛台涵元殿,与慈禧太后同住。二月初一日至初三日,光绪帝回宫中居住,也同样有理由。从此日起斋戒三天,初四日光绪帝祭社稷坛并在坤宁宫率王公大臣进肉后,当日移居瀛台涵元殿。二月二十七日,光绪帝跪送慈禧太后还颐和园后,当日回宫中养心殿。

闰三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慈禧太后为探望恭亲王奕訢,住西苑仪鸾殿,光绪帝随即移住瀛台涵元殿。十八日,慈禧太后回颐和园,光绪帝一路送回,当晚住颐和园玉澜堂。

六月初八日,慈禧太后为其夫君咸丰帝的生日回西苑,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后,移住瀛台涵元殿,初九日在顺贞门内跪送后,回宫中养心殿。

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为光绪帝生日回西苑,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后移住瀛台涵元殿;二十四日慈禧太后移住宫中宁寿宫养性殿,光绪帝移居宫中养心殿;二十七日慈禧太后移住西苑仪鸾殿,光绪帝仍住宫中养心殿,然二十八日又是其27周岁的生日;二十九日,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送慈禧太后,仍住养心殿。

七月十四日,慈禧太后为咸丰帝忌日而回西苑,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后移住瀛台涵元殿;十八日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送慈禧太后回颐和园后,回宫中养心殿。

由此可见,八月初四日申刻,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慈禧太后后,移住瀛台涵元殿是正常现象。反过来说,若此时光绪帝回到宫中养心殿,倒显得不正常了。蔡乐苏先生2001年著作对此称:“涵元殿在瀛台,是政变后慈禧软禁光绪帝的地方。政变之前,光绪虽常驻蹕涵元殿,不过八月初四这天晚上,大概是慈禧要他驻蹕在这里,这其中包含什么,只好由后人自己去想像了。”这一段话写得并不清楚。其中慈禧太后要光绪帝移住瀛台,很可能是蔡先生的想像。但他后称“慈禧回宫怒斥光绪之后,光绪即失去自由”,可见他还是同意孔祥吉先生的观点,即八月初四日为政变之日。

以上说明,不能凭借八月初四日光绪帝移居瀛台以证明此日即被囚禁;反过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即不能以光绪帝按旧例移住瀛台来证明其未被囚禁。然在该日《内务府来文》中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似可说明光绪帝还处于自由状态:

领侍卫内大臣处为咨行事。奉旨:“朕于明日办事、用膳、召见毕,乘轿至丰泽门下轿,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乘轿回瀛台少坐,至勤政殿升座,见日本国侯相,毕,乘轿还瀛台。午初伺候。钦此。”右咨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相同的记载见内务府《日记档》:

(初四日)适侍卫处来文,为明日皇上办事后,诣皇太后请安,毕,至勤政殿召见日本国侯相,毕,还瀛台。午初侍候,已

以上据《清代起居注册》,并对照宫中《穿戴档》。
《内务府来文 外交》,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

缮禀帖发公所,并入事、交钞矣。

相同的记载又可见八月初四日奉宸苑《值宿档》:

询得初五日皇上办事、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瀛台。午初升勤政殿,见日本侯相,毕,还瀛台。

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完全可以想像慈禧太后回西苑后,与光绪帝之间会有相当激烈的冲突;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见后,仍一如既往地侍卫布置八月初五日的日程安排。从这一日程安排来看,光绪帝不仅没有失去自由,而且是在其完成“办事”、“召见”的政务活动后,再向慈禧太后“请安”。

(四)八月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单独处理政务

八月初四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的夜晚,一定是不平静的。但在第二天,我以为,光绪帝依旧是单独行使皇帝的权力,处理政务。

据该日宫中《穿戴档》:

上戴绒草面生丝缨冠(缀珠重七分),穿酱色江绸单袍,石青江绸单褂,戴斋戒牌。束绿玉钩搭线鞋带,穿青缎凉里尖靴。卯正,外请至勤政殿见大人,毕,还涵元殿。寻常褂下来,更换石青江绸单金龙褂,戴珊瑚朝珠,挂带挎。午初,外请至勤政殿,朝见外国人等,毕,还涵元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褂。

这是一份不完整的记录,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向慈禧太后请安、侍膳的记录。据该日《起居注册》,“上诣仪鸾殿慈禧皇太后前请安”,特别指明请安地点在仪鸾殿。按照前引领侍卫内大臣的来文,在

该《日记档》封皮注明“署中”,即为西苑所专用(内务府《日记档》分多种,此为一种),档案编号为405/5—14/杂记类243/日243。

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

勤政殿召见“大人”后,应直接去仪鸾殿慈禧太后处请安,由于没有回涵元殿换衣服,于是负责记录的太监在《穿戴档》中将此事省略了。

又据军机处《早事》、《早事档》,该日为兵部、太常寺、八旗两翼值日。在早朝中,光绪帝批准了兵部的3件议复;批准了太常寺6件关于八月初八日光绪帝亲祭夕月坛等礼仪事务的折片,并对3件派出官员的请示,做出直接的答复;对御前、乾清门、吏部、兵部所奏月折,旨命“换出”,对宗人府、吏部、正白旗蒙古的“迷旨”,旨命“是”;批准了领侍卫内大臣为初六日、初七日光绪帝去宫中、社稷坛而派出前引、后扈、管事的人员;批准了镶黄旗汉军在卢沟桥演炮事;批准了神机营制造火药及训练费用请部拨事;留下了宗人府、翰林院、户部、总理衙门、兵部、都察院代奏的司官士民上书共17件;留下了南书房翰林徐琪、散秩大臣锡光、日讲起居注官陈秉和、御史宋伯鲁封奏共8件。召见了请训的袁世凯和军机。

又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交片档》,光绪帝对留下的徐琪的1折2片,有明发谕旨1道、交片谕旨2道;对留下的锡光、陈秉和、杨深秀的5折片,皆下旨“存”;另有一明发谕旨,任冯汝骥为四川顺庆府知府。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光绪帝在热河都统寿荫、署理四川总督恭寿、江西巡抚德寿、陕西巡抚魏光燾、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振祜、护理江西巡抚翁曾桂、署理江西布政使张绍华、署理江西按察使刘汝翼、江西学政李绂藻等的40件

清代制度,每月各衙门将该月奏折汇奏一次,同时换出上月的奏折汇奏。每月各衙门将奉到谕旨汇奏一次,以得到皇帝的认可。

此外还批准了关于奎仪卫、会典馆、崇文门等细小事件,批准了那彦图等3人的请假,并对徐树铭管理三库谢恩折表示知道了。

折片上做朱批。这一天朱批的大致情况,在军机处次日向慈禧太后所呈报的“朱批折件事由单”中反映得相当清楚:

八月初五日。寿荫奏练军出力各员遵驳改奖折,单一件,奉朱批:吏部议奏,单并发;又奏六月分粮价,奉朱批:知道了。恭寿奏办理官运出力人员援案请奖折,单一件,奉朱批:著照所请,吏部知道,单并发;又奏顺天府知府耆年请假修墓遗缺请旨简放折,奉朱批:另有旨;又奏四川省办理昭信股票情形片,奉朱批:览奏已悉,昭信股票业经降旨停办矣,余依议;又奏夔关奏销仍难依限造报片,奉朱批:户部议奏;又奏四川省武职借补章程请展限办理折,奉朱批:兵部议奏;又奏解铁路经费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新海防第九十一、二次捐输请奖片,奉朱批:户部议奏;又奏马边厅同知沈麟庆边俸期满请循例升用片,奉朱批:吏部议奏;又奏新海防捐输银数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射洪等属被灾抚恤情形折,奉朱批:著奎俊饬属将被灾州县,认真筹款赈抚,以拯灾黎;又奏请将丙甲纲杂款银两划归副本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在任候补直隶州知州缪延祺等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德寿奏加收二成茶糖厘金银数折,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上年下半年收支厘税银数折,单一件,奉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又奏新海防第五十八次请奖折,单一件,奉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翁曾桂奏接护抚篆日期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张绍华奏接署藩篆日期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刘汝翼奏署理臬篆日期谢恩折,

由于当时的官员有不小的调动,而普通奏折上报的速度很慢,所列的官职只是其奏折上的官职,实际的职位已变:热河都统寿荫已调广州将军,署理四川总督、四川将军恭寿已去世,江西巡抚德寿已调任江苏巡抚,而广东巡抚一职已裁,许振祜奉旨调京。

奉朱批:知道了。李绂藻奏袁州等属岁试情形折,奉朱批:知道了。魏光焘奏略阳等属被灾情形由折,奉朱批:知道了,所有被灾各州县著飭所属认真抚恤,毋任失所;又奏副将张镇南等玩视捕务请革职片,奉朱批:张镇南等著即革职,余依议,该部知道;又奏五月分雨泽禾苗情形折,奉朱批:知道了;又奏解还英德洋款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补用知府魏景桐调管差委片,奉朱批:知道了;又奏四川重庆知府王道文病请开缺片,奉朱批:吏部知道。谭鍾麟、许振祜奏知县谢裕棠期满甄别折,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已故儋州知州贾敦忭欠解银两请革职勒追片,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又奏知县于德松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已革知县童凤池完解欠款请将参案注销折,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又奏委候补道蒋武琛署督粮道片,奉朱批:知道了;又奏新授南韶连道张端本到省飭赴新任片,奉朱批:知道了;又奏查明各州县民欠钱粮数目片,单一件,奉朱批:户部议奏,单并发。许振祜奏六月分雨水粮价折,单一件,奉朱批:知道了。崇善奏因伊子补授笔帖式叩谢天恩折,奉朱批:知道了。^①

以上的档案当然还不能完全证明八月初五日光绪帝是单独处理政务,为此,我在这里补充3项证据。

其一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称这一天他是被光绪帝单独召见,而不是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同见。这说明慈禧太后尚未走到前台。袁世凯后来的亲信张一麐称:“次日(八月初五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诮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②也有

①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5/80。

②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1941年排印本,第25页。

一些研究先进引此认为光绪帝已被监控。细心地检视这一段记载,可以认定,某侍卫大臣为慈禧太后派来的探子是袁世凯事后的主观推测,此时袁世凯正处在旋涡之中,对任何细微之处都不敢马虎。由此也可以认为是袁世凯主观想像的放大;更何况“好小子”一语,也可有多种理解,比如说对袁世凯超擢的稍带挖苦味的评论。

其二是当日《上谕档》所载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

本日翰林院编修徐琪奏各省州县繁简互调以免偏重折,奉明发谕旨一道,又奏请广东省磁务以开利源折,奉交片谕旨著农工商务总局酌核,又奏请于京城设立自来水厂,奉交片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归入叶大道修理河道条陈一并议奏。御史杨深秀奏时局艰危请联与国折,又请开凿窖金片;委散秩大臣锡光奏挑挖沟渠河道折,又请将幼官学改小学堂片;裁缺庶子陈秉和奏大臣滥保劣员折,皆奉旨“存”。又七月二十七日都察院代递举人何寿章请严定贩米章程折、八月初一日翰林院代递庶吉士傅增湘奏兴办矿务学堂变通旧章折、初二日代奏编修黄绍第奏编辑近时政书折、请就各省会馆置中小学堂片,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谨将徐琪等原折片十二件,恭呈慈览,其余各折片俟签拟办法,再行陆续呈递。谨奏。

该奏片明显地说明此日的政务处理原则有如八月初三日,即有上奏权的官员的奏折由光绪帝处理,没有上奏权的司员士民的条陈,由新军机章京拟出处理意见后呈慈禧太后审定。而且,这是《上谕

清代制度,侍卫大臣带领引见,不过到门口宣导,不得入内。袁世凯此日召见当在勤政殿,侍卫大臣在门外能否听见袁世凯的言论,是值得怀疑的。另,张一麐的记载中有不少史实错误,须小心使用。

档》、《洋务档》中所载最后一份此类报告。第二天,八月初六日以后,此类重要奏折当日呈送慈禧太后的制度被停止了,慈禧太后不再需要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日军机处档册《早事》中记:

皇上明日卯初二刻升中和殿看版,毕,还海。办事后至瀛秀园门跪送皇太后,毕,还宫。

《早事》是军机章京记录的每日早朝、召见、请假等事项的工作底本。以上所录是光绪帝告诉军机处其明天工作日程的安排。其中“办事后”一语,是指其明天仍是单独见军机;“瀛秀园门跪送”一语,是指光绪帝认为慈禧太后会照原计划于初六日回颐和园;“还宫”一语,是指光绪帝初六日跪送慈禧太后之后将移住宫中养心殿。同样的记载又见于军机处《知会簿》:

该班供事稟:皇上明日卯初二刻升中和殿看祝版,毕,还海。办事后至瀛秀园门跪送皇太后,毕,还宫。满头班全开会。八月初五日。

《知会簿》是军机处供事通知当日不当值的军机章京各有关事项的记录本。负责记录的是比军机章京地位还低的供事。八月初五日是军机处二班章京入值,初六日改头班章京入值,由此二班的供事向头班的章京老爷们做此通报。其通报的内容与军机处《早事》军机章京所记完全相同。这些记载明确无误地说明,此日是光绪帝单独处理政务,而且,在当日军机处散值前,光绪帝和军机处都不知道风暴已至。

尽管当日光绪帝仍是单独处理政务,但从当日所发的谕旨来

军机处《早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看版”是指看八月初七日祭社稷坛所用祭词。

军机处《知会簿》,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立,《军机处簿册》第125盒之一。

看,维新的政令已是色彩暗淡,整个王朝的政治已经开回旧路了。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回西苑后给光绪帝下达了极为严格的指令。

综上所述,可略做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慈禧太后看到杨崇伊的奏折后于八月初三日晚戌时决定回西苑,同时决定于初六日回顾和园。她此行的目的不是针对光绪帝的,而是与伊藤博文的觐见有关。光绪帝依旧例移住瀛台涵元殿,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八月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尽管维新的道路已被慈禧太后封堵得差不多了。

五、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前后

八月初五日,当光绪帝单独处理完政务,从勤政殿前往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时,风暴发生了。从时间的刻度来看,《穿戴档》称光绪帝卯正(上午6时)前往勤政殿处理政务,总理衙门致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公函称,午初刻(约中午11时)在勤政殿召见伊藤博文。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请安,当在这两个时间之间。

(一)八月初五日慈禧太后决定回顾和园时间推迟至初十日
从内务府《杂录档》中,可以看到一条特别的记载:

八月初五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十日皇上前往颐和园去,所传车辆、马匹、苏拉等改为福华门外,各该处照例预备。差首领滕进喜传。

该日有关维新的政令,是将徐琪关于开发磁务和建自来水厂的奏片交农工商总局、总理衙门议复,而对其他奏折皆下令“存”,即搁置。此与八月初四日相比,更可见维新运动实际已经停止。

内务府《杂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 1004/ 杂 263。

与前传对照,原先黄车、青车“在顺贞门外预备”,马匹等“在西三座门外预备”,即光绪帝从宫中动身,此次改为“福华门外”,表示光绪帝将从西苑动身。也就是说,光绪帝不能回宫中去了,将在西苑住到初十日,前往颐和园。

此一改动是什么意思呢?《内务府来文》中有明确的记载:

八月初五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六日圣母皇太后还颐和园,今改为本月初十日还颐和园。所传引导、跟随、车辆、马匹于是日寅初在福华门外各该处照例预备。差首领滕进喜传。

内务府《日记档》同日对此也有记载:

改传引导、跟随杂一件,已交抄,并入事讫。

初十日皇太后还颐和园黄记载,已交抄,已回立(山)、启(秀)、世(续)堂及奎公,已令书吏缮出崇(光)、文(琳)禀帖发公所矣。

皇太后引导、跟随、行步军统领衙门文一件,奏片、引文全分,站班禀帖贰分,均发公所矣。

皇后、瑾妃引导、跟随禀报帖及行文均发公所讫。

据以上记录,可知慈禧太后将初六日回顾和园,改为初十日,皇后、

《内务府来文 巡幸及行宫》,光绪二十四年六至十二月。该件下附有初十日慈禧太后还颐和园行程安排的黄记载。

内务府《日记档》(署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 243/日 243。引文第一段即为前引《杂录档》之事。引文第二段“已令书吏缮出崇、文禀帖”即下引《车费档》之事。当时崇光在颐和园值班。

瑾妃一同随行。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将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由此,内务府还依例拟定了慈禧太后初十日回颐和园的各种安排。由于此一改变还牵涉到颐和园的准备,内务府的一个小档册《车费档》也有记载:

八月初五日,端大老爷赴颐和园,呈回崇(光)大人,为进奉改期及多、桂等道司、堂谕。车费二十吊。

由此可见,因情况紧急,西苑方面立即派人通知正在颐和园值班的内务府大臣崇光,否则他将在颐和园准备接慈禧太后次日回园各种事务。此时正在颐和园的内务府升平署,在其《日记档》也有一补充记载:

又补。初五日敬事房传旨:于八月初十日老佛爷驻蹕颐和园。特记。

慈禧太后的这一决定,完全改变了事情的性质。我在前节说明,慈禧太后初四日去西苑、初六日回颐和园的决定,不是针对光绪帝的,而是为了初五日伊藤博文的觐见,因为初六日到初十日光绪帝还有独自处理政务的空间与时间;此次决定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也就是说对光绪帝不再信任,要将光绪帝置于其身边。

慈禧太后的这一决定,其原因为何,当属此日与光绪帝见面时另有一场争论。其争论的主旨及双方的言词,档案中毫无记载,无

《内务府来文》中有皇后、瑾妃于八月初八日由宫中移住西苑,初十日前往颐和园的相关文件(《内务府来文·巡幸及行宫》,光绪二十四年六至十二月)。

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记:八月初五日“由堂来抄八月初十日皇太后在仪鸾殿进早膳毕,乘轿出瀛秀园门,由福华门、西三座门、西安门、西直门至倚虹堂少坐,乘船至广源闸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下轿,至水木自亲(码头)下船,步行至乐寿堂驻蹕等因。”

内务府《车费档》,401/5—10/N/财务类476/车48。端、多、桂应是内务府的官员。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该记载是八月初七日以后补记的。

从得知。如果说是为伊藤博文的觐见,似为不太可能。因为前已说明,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而言,初四日慈禧太后回西苑后当面向光绪帝交待清楚,光绪帝必然会一一照办。

光绪帝的宠臣张荫桓后来被戍,押解他的官员留下了一份记录,称:初五日光绪帝召见伊藤时,“太后在帘内”。此一说法为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所驳,对此我是同意的。一是勤政殿内一时无法设帘;二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在场,慈禧太后无须亲自出面。还有一个情况也值得注意,在军机处档案中,有当时伊藤博文觐见的文字记录。共两份,一份字迹清楚,有如奏折;一份字迹较草,有如录副。这两份记录是给谁看的?如果说总理衙门留此记录,作为以后的备忘录,当属外交中的正常之事;军机处留此记录,则应是为光绪帝或慈禧太后提供的。但档案中对此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两份记录的用处,我以为,很可能是呈送慈禧太后的。

伊藤博文的觐见持续了15分钟。光绪帝在召见时表示了与日本加密关系的倾向,但在实际事务方面仅表示了将通过总理衙门向伊藤了解“变法次序”,并没有出现慈禧太后等人最担心的重用伊藤以为“客卿”的言辞。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若仅为伊藤博文的觐见,第二天便可以放心地回颐和园,可她为什么要留下来,到初十日与光绪帝一起回颐和园呢?

由此,问题的要害显出来了,初四日晚慈禧太后见过光绪帝之后到初五日上午再见光绪帝之前,慈禧太后见过了什么人?得到

王庆保、曹景邨:《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491页。该记录错误甚多,如康有为的资金来源为孙文;康有为、康广仁每日入大内,与皇上坐论新政等等,不像是深知内情的张荫桓所言,可能其中相当部份是记录者私加的。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7/5617/9、10。

了什么消息？然清代的档案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有关慈禧太后的档案我一直未见，对此我不能做出答复来。

慈禧太后推迟回颐和园，是否意味着已决定训政开始？对此，我也不能得出结论来。内务府档案中有当天的两份文件：

领侍卫内大臣为知照事。八月初五日由内奏事口传，奉旨：朕于明日办事毕，由勤政殿檐前乘轿出德昌门、西苑门，进西华门、右翼门、中右门至中和殿阅视祝版，毕，乘轿由后左门进乾清门，换轿至圣人前拈香，毕，乘轿出乾清门、隆宗门、西华门，进西苑门、德昌门，还瀛台。更衣，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还瀛台。卯初二刻伺候。钦此。须至知照者。右知照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由侍卫处询得初七日皇上办事后出西苑门，进西华门、熙和门，出午门至社稷坛致祭，毕，仍由旧路还海。召见后，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还瀛台。站班人员均穿补褂。堂、司稟、启帖等均办登记。

前一份文件涉及到初六日的日程，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领侍卫内大臣未见到光绪帝，而是由内奏事处太监传旨，故向内务府行文不用“咨”而用“知照”；其二是光绪帝先在勤政殿“办事”，“卯初二刻”即上午5时半左右前往宫中阅视祭社稷坛的祝版，并为孔子拈香；其三是光绪帝“召见”可能在瀛台，当然也可能在勤政殿，并

《内务府来文 礼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441/5—50—1/N/第323包。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也有相同的记载：“初五日由侍卫处询得，明日卯初二刻皇上办事毕，乘轿出德昌门、西苑门，进（西）华门、右翼门，至中和殿阅视祝版，毕，进乾清门，至圣人前拈香，毕，出乾清门、西华门，进西苑门，还瀛台。站班人员均穿常服挂珠。堂、司启帖均发。”

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记。

没有说明;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光绪帝处理完政务后才去向慈禧太后“请安”、“侍膳”。如果将此与前引八月初五日军机处《早事》的记录相比较,可以看出,光绪帝传出此旨,时在见到慈禧太后之后,也有可能是召见伊藤博文之后。后一份文件涉及到初七日的日程,由于事关内务府官员的站班,故向侍卫处主动打听,也就是说,侍卫处在八月初五日已知光绪帝初七日的日程安排。从光绪帝这两日“办事”、“召见”后才“请安”、“侍膳”的时间安排来看,他本人还不知道第二天慈禧太后的“训政”;尽管我们还无法知道慈禧太后此时心中是否已经做出了决定。

(二)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

八月初六日《上谕档》载:

内阁奉 上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上谕档》在此谕旨上还专门注明“朱笔”,以说明此一重要的谕旨是光绪帝亲写。可是光绪帝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写下此一朱谕?为此查宫中《穿戴档》,该日记:

上戴绒草面生丝纓冠(缀珠重七分),穿蓝江绸单袍,石青江绸单金龙褂,戴斋戒牌,戴伽楠香朝珠,束绿玉钩搭线鞮带,挂带挎,穿青缎凉里尖靴。卯初外请至中和殿阅视祝版,毕,至圣人前拈香,毕,还勤政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褂,见大人毕,还涵元殿。

从这一记载来看,与前引领侍卫内大臣的知照有所不同。其一是

去中和殿前没有“办事”的记录,且似从涵元殿出发,而不是从勤政殿出发;其二是从宫中看祝版、拈香后没有回涵元殿,而是去了勤政殿。再查《起居注册》,该日记:

卯刻,上诣中和殿阅祝版,诣圣人前拈香,毕,诣仪鸾殿慈禧太后前请安,驾还涵元殿。

此一记录与前引领侍卫内大臣知照的相同处,在于仪鸾殿请安,但请安在勤政殿“见大人”前还是“见大人”后,没有明确的记载。再查军机处《早事》,该日记:

刑部、都察院、侍卫处值日。江宁藩司袁昶到京请安。出使大臣徐寿朋到京请安。李征庸谢授头品顶带。冯汝骥谢授四川知府恩。召见袁昶、徐寿朋、李征庸、冯汝骥、军机。皇上明日寅正至社稷坛行礼,毕,还海办事、召见大臣。

此一记录同以前一样,没有时间的记录。再查宫中《召见单》,该日在“京官”册中记:“徐寿朋(出使大臣)”;在“外官”册记:“袁昶(江宁布政使),冯汝骥(四川顺庆府知府),李征庸(简放道)”。也无时间的记载,再查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其他档册,皆无时间的记载。

由此,我这里似可以大胆推测出一个时间表:光绪帝这一天早晨可能没有到勤政殿出席早朝,而是直接从涵元殿去宫中看祝版、拈香;从宫中回来去了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然后又与慈禧太后共同来到勤政殿,也就是前引上谕中“今日始在便殿办事”;处理完

江宁布政使袁昶上有新政的条陈,并交由军机处议复,奉旨进京召见。徐寿朋是新任派往韩国的使节。李征庸原为二品顶带记名道,因捐银2万两以助蜀学堂,由孙家鼐保举,得赏头品顶戴。又据该日《早事档》,由阔普通武保举的兵部员外郎祁师曾、由侍讲学士陈兆文保举的翰林院庶吉士李稷勋,应本日觐见,奉旨:“初八日递牌子。”后又改在初九日觐见。祁师曾当日未觐见,郑孝胥在其日记中称:“晨,祁君月来,言入内未召见,又闻太后本欲幸颐和园,今不往,至初十乃往。余曰:‘但恐乱作于日内,奈何?’”(《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

政务后,光绪帝回到涵元殿。如果按照这一时间表,那么,光绪帝正式交出权力由慈禧太后训政,似在仪鸾殿请安时;而将“训政”朱谕下发下军机,似在勤政殿召见时,而且是光绪帝与慈禧共同召见。

如果我的这一大胆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光绪帝为什么改变了初五日通过内奏事处下达给领侍卫内大臣的时间安排,即先“办事”,再去宫中,再回涵元殿“召见”,再去慈禧太后处“请安、侍膳”?这里面只有一个可能,即光绪帝初五日中午召见伊藤博文回到涵元殿之后到初六日清晨早朝之前,涵元殿与仪鸾殿之间另有接触,或者是光绪帝去过仪鸾殿、慈禧太后去过涵元殿,或者是慈禧太后派人到涵元殿向光绪帝下达了新的指令。可惜我对此不能提供新的材料。

事实上,问题的要害仍是我在前面提出的:慈禧太后到西苑后,见过什么人?听到了什么事?

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称荣禄于八月初四日由津回京,见过慈禧太后。我以为,此说尚有疑问。从前引荣禄致总理衙门有关山海关、大沽军情的电报可知,八月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他皆有发自天津的电报。这当然也有可能由别人以其名义代发。从袁世凯《戊戌日记》可知,当他于初五日下午到达天津时,荣禄也在天津。仅从时间上来看,荣禄如秘密回京,是难以安排的。假如荣来北京,须乘八月初五日上午的火车返回,如果是骑马的话,八月初四日晚城门关闭前须离开北京。且清代制度,督抚大吏离开职守,需事先请旨。荣禄回京必不敢请旨,而只能是微服私行。考虑到当时光绪帝与荣禄之间不太和谐的关系,荣禄私行,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最重要的是,他冒着风险进京见太后

北京的冯志先于八月初九日电上海的盛宣怀:“自初六起,召见大臣,均太后、皇上一同训话。”(《愚斋存稿》卷33,1939年思补楼刻本,第7页)

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他从袁世凯处得知康、梁有所发动,冒此风险还是值得的。谭嗣同离开法华寺时已是初三日深夜。如果袁世凯有心告密的话,最佳方法当是请荣禄的折差(袁日记称“专弁遗书”)带急信回天津,由于此时城门已关,荣禄的折差无论乘火车或骑马,当在初四日一早出行,中午以后方可见到荣禄。荣禄下午赶紧进京,初四日晚可在西苑见到慈禧太后(返回的时间可能过紧)。此时袁世凯尚在北京,按照慈禧太后的性格,当晚西苑应有大事发生,光绪帝不可能在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单独召见袁世凯,而拿捕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也应在初五日进行。黄先生在其著作中已经相当充分地证明了袁世凯告密在其初五日回天津之后,那么,荣禄就没有特殊的理由初四日秘密微服进京。如果是当面劝慈禧太后训政,不太像荣禄办事老练的性格;如果仅是向慈禧太后表示忠诚,他完全可以用书信或其他方法。由此再查黄先生所引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致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电报,发于八月十九日,当时北京的各种谣言甚多,林本人并无秘密管道,这从当时他所发出的其他电报可知。他的这一说法,很可能是听到了其时的某一传说。称荣禄初四日进京的说法,并不可靠。刘凤翰先生1964年论文提出的荣禄初五日进京说,已被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所驳,对此我是同意的。

王树卿先生1990年著作称:八月初六日早上,慈禧太后“按原

关于荣禄折差的情况在宫中《日记账簿》中有记录:“七月十六日,直隶总督荣禄三封(请安二封、进单一封),差弁李祥,于十七日发去。”“七月十九日,直隶总督荣禄五封(请安二封、奏事三封),用兵部印花封发回,差弁邹麟,于二十一日发去。”“八月初一日,直隶总督荣禄四封(请安二封、奏事二封),用兵部印花封发回,差弁安景昌,于初三日发去。”“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荣禄四封(请安二封、贺训政二封),用兵部印花封发回,差弁闪殿甲,于本日发去。”(《宫中各项档簿》簿1129号、簿1130号)四位折差皆不同,可见当时直隶总督的有关文件皆专弁送至。

来计划返回了颐和园。可是,慈禧太后并没有住下,突然接到荣禄自天津打来的电报,盛怒之下,马上用轻轿快班,急速向北京城里进发。”王先生此处未注明出处,但其确有所依据。先看慈禧太后返回颐和园一事。内务府《杂录档》中记:

八月初六日,圣母皇太后在仪鸾殿进早膳毕,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仪鸾殿乘轿出瀛秀园门、福华门,由西三座门出西安门、西直门,至倚虹堂少坐。乘船至广源闸东马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西马头下轿。乘船至水木自亲马头下船,步行还乐寿堂。圣驾驻蹕颐和园。

王先生的著作提到了内务府《杂录档》,其依据可能在此。然此一文件仍是内务府的事先请示,当时的名称叫“记载”或“黄记载”(因为写在黄纸上,故有此名)。其作用是事先拟好行程后请示慈禧太后认可,以便执行。它不是事后的记录。而这一份“黄记载”什么时间发下的呢?为此查内务府《日记档》,于八月初四日中有此记载:“敬事房传出初六日皇太后还颐和园记载一件,已发署粘连。”由此可见,此一记载仍是初四日慈禧太后去西苑前所定,

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 1003/ 杂 262。

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 244/ 日 244。又,查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在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返回颐和园的“黄记载”之后,还附有八月十四日回颐和园的黄记载:“八月十四日,圣母皇太后在仪鸾殿进早膳毕,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仪鸾殿乘轿出瀛秀园门、福华门,由西三座门出西安门、西直门,至倚虹堂少坐。乘船至广源闸东马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西马头下轿。乘船至水木自亲马头下船,步行至颐乐殿看戏、进晚膳,戏毕,乘轿还乐寿堂。圣驾驻蹕颐和园。”再查《内务府来文》,此“黄记载”粘于八月初九日慈禧太后改期回颐和园的来文之后。(《内务府来文 礼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一月,441/5—50—1/N/ 第 323 包)由此可证此类记载为事先请示的日程安排,非为事后的记录。

不能作为初六日慈禧太后回顾和园的证明。再看荣禄的电报一事。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于八月十四日电告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

我从可靠的来源得知，中国皇帝突然被废及康党受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归于中国皇帝在9月19日召见袁世凯所给他的秘令，要他率4000军队由小站军营开往宫廷，充作御林军。第二天，袁在回小站的路上向属于后党的直隶总督泄密。消息立即以电报发给慈禧太后，而她立即重出于权坛。我不知道王先生的电报说是否据此，然郑永昌所称“可靠的来源”，很可能是梁启超，他正护送梁启超、王照由天津去大沽以登日本军舰。而梁启超的消息恰恰是不可靠的。关于荣禄发电给慈禧太后的说法，已被骆宝善先生1999年论文、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所驳，对此我也是同意的。

以上分析说明，慈禧太后没有见过荣禄，也没有收到荣禄的电报。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决定重新训政呢？

由此再回到刘凤翰先生1963年论文中提出的问题：袁世凯日记关于初四日凌晨零时至初五日凌晨六时共30小时“只字未提，实在令人怀疑”。我对此有同感。郭卫东先生2002年论文对此30个小时也有同样的疑问。虽郭先生所称八月初四日一大早袁世凯去海淀告密，导致慈禧太后回西苑发动政变，由于时间与慈禧太后初三日晚的决定不符，而不能成立，但他提到的告密对象庆亲王奕劻，却是此次政变的主角之一。由此而进行思索，郭先生的思路也有其可以延伸的意义。当时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已如绷

这一条材料最先由黄彰健先生引用，原件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各国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崩御、袁世凯罢官”，1—6—1—4—2—2，第1册。

紧而即刻可断的发丝,只要听到一点风声,不要太多的证据,即刻会出大事。也就是说,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徐世昌,只要向奕劻等人稍露口风(且不管在城内或海淀的何地),如“康有为将有不利之事”之类的暗示,即可变为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的实际行动。可是没有材料的怀疑还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刘、郭两先生的袁世凯告密说仍然是连接不上的链条。

据此再检视八月初六日的政令,首先是捉拿康有为。《清实录》中称:“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然该谕旨在军机处的《上谕档》、《随手登记档》、《交片档》、《交发档》、《交事》各档册中均不载。按照当时的习惯,此旨若由军机处发出,应是交片谕旨,其写法为“交步军统领衙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工部主事康有为……”应录于《上谕档》、《交片档》,并在《随手登记档》中留有记录。以上军机处各档册未录,说明此旨未经过军机处。由此再查《清实录》,竟注明此谕旨录自《东华录》!档案中最先出现此旨,为八月十一日以刑部尚书崇礼为首的奏折:“本月初六日,步军统领衙门奉密旨:工部主事康有为……”崇礼为刑部尚书又兼任步军统领,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之臣,他可能不是从军机处受旨,而是直接从慈禧太后处受旨。对此郑孝胥在该日日记中称:“长班来报,九门提督奉太后懿旨锁拿

《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8页。

当时以李鸿章为首的内阁,每月须向皇帝汇奏奉到的谕旨。查此宫中谕旨汇奏,不见该旨。内务府堂每日抄录上谕,查该府《上谕档》,也不见此旨。由此可以肯定,此旨未经内阁。《清实录》引此旨,用“谕军机大臣等”,应当是“字寄”,也与当时谕旨体裁稍有异。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5页。其所引谕旨与《清实录》相比,仅是称谓中增两字,即“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

康有为,康已出都,其弟康广仁及家丁五人已被拿获。”

慈禧太后未经军机处而直接命步军统领捉拿康有为,是否为了保密的需要?因为军机处毕竟还有慈禧太后最不信任的新任四章京。我以为似无此必要。因为当天收到了宋伯鲁请与英、日结盟并保康有为的奏折,则由内阁明发上谕:“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中“滥保匪人”指的就是康有为,而此旨由军机处发下。

我以为,慈禧太后未经军机处命步军统领捉拿康有为,可以说明两点,其一是有人向她报告康有为尚在北京,否则不会令掌京城内外门禁的步军统领捉拿;其二是很可能她曾命光绪帝捉康,而光绪帝未能及时执行或拒绝执行,不过这完全是我的推测。

我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大胆想像了这样一个场景:即在光绪帝八月初五日接见伊藤博文之后,到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的某一时刻,慈禧太后得到报告,康有为尚未离开北京,康有为、康广仁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甚至听到某种康有为欲有所发动的传闻,她命令光绪帝将康氏兄弟抓起来送刑部审讯。光绪帝对此表示不能从命。于是,慈禧太后出示杨崇伊的奏折,光绪帝见有“仰恳皇太后……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咨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一语,只能跪请皇太后“训政”。慈禧太后因此密令崇礼捉拿康氏兄弟。我的这一并无材料的大胆假设,只能留待以后证实或证伪了。

消息灵通的内务府官员,很可能听到了什么。初六日清晨,光绪帝由西苑去宫中中和殿看祝版,路过西华门内的内务府衙门,该

《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府官员照例须在衙门前站班,可这天居然有许多官员未能出席。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其政策取向还不是完全倒行逆施。除了捉拿康氏兄弟,将宋伯鲁革职外,并无其他停止新政的谕旨。当日收到侍读学士李殿林用机器纺棉的奏折,奉交片谕旨:“著农工商总局酌核办理”;收到侍讲学士秦绶章及由总理衙门代奏的北洋委用道傅云龙的奏折,奉交片谕旨:“北洋委用道傅云龙请设制造银钱总局,又侍讲学士秦绶章奏请由工务总局开铸银元各一折,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归入刘庆汾等前奏内一并妥议具奏”;收到总理衙门代奏郑孝胥保萨镇冰奏折,发出一电旨:“著荣禄详细察看,据实具奏”。收到湖北巡抚谭继洵保举使才奏折,奉明发上谕:“谭继洵奏遵保使才一折,在籍翰林院检讨宋育仁,湖北候补知府洪常,著各该督抚饬知该员来京,预备召见。”此4道谕旨似乎还给人以新政继续进行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光绪帝虽与慈禧太后同见大臣,但他的朱批权并没有取消,尽管已无实质性的内容。关于这一天的朱批情况,可见第二天上报慈禧太后的“朱批奏折事由单”:

八月初六日,文光奏成都将军恭寿因病出缺折,奉旨:留中。德寿奏交卸抚篆起程日期折,奉朱批:知道了;又奏张绍华等署藩司各缺折,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保荐道府贤员折,奉旨:留中;又奏筹解金陵老湘等营军饷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保荐道员贺元彬折,奉朱批:贺元彬著送部引见;又奏劝办息借商款各员择尤请奖折,奉朱批:吏部议奏;又奏查明通商口岸

内务府文件称:“堂交。奉堂谕:本月初六日皇上由西苑进内升中和殿看视祝版,是日站班司员人数不齐,实属不成事体。著交各司处传知各该员,嗣后每遇站班之日,务须尽早为承应,以昭慎重。倘有无故不到者,即将乌布开去。勿谓言之不豫也。特谕。此交。”(内务府《堂谕堂交》,光绪二十四年,445/5—54/包号 171)

见八月初六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电寄档》。

路矿事宜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谭锺麟、许振祜奏已革知府卢秉政报效银两请开复折,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又奏卢秉政前参未允折,奉朱批:知道了。谭继洵奏解厘金京饷银两折,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解地丁京饷银两折,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六月分雨水粮价片,单一件,奉朱批:知道了;又奏遵保使才折,奉朱批:另有旨;又奏遵保人才折,单一件,奉旨:留中。邓万林奏出洋督巡日期折,奉朱批:知道了。

八月初七日的谕旨,也还算是平和,尽管已经下旨加强紫禁城、西苑、颐和园三处的警卫,并发电袁禄捉拿康有为。光绪帝继续有朱批权,但此日的谕旨同前一天一样,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据这一天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召见了崇礼、洪用舟和军机。召见崇礼,很可能是听取捉拿康有为的汇报;洪用舟是新任山东东昌府知府。又据军机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选用道陈日翔、刑部候补主事陈桂芳本应本日覲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5/82。

该日由内阁明发上谕:“禁城内外,理宜严肃。前经屡次谕令值班官役,认真巡缉。近来仍有闲杂人等,任意出入,实属玩弛,不成事体。所有紫禁城、西苑、颐和园三处,著步军统领衙门遴派官弁,带领番役,各在宫门内外,分段巡逻,不准稍有疏懈。其旧有护军营管理地方,仍著该统领等严飭派出各员弁,认真巡逻,以重门禁。倘再仍前玩误,定当查取职名,从严惩办。”(见该日军机处《上谕档》)根据此谕,内务府也发出堂谕:“堂谕:本月初七日由内阁钞出,奉上谕:‘禁城内外……’查朝廷之于门禁屡下明诏,不啻三令五申,凡禁廷各门座值班弁兵,应如何敬谨稽查,以重责守。乃近来屡有疏懈情事,甚非朝廷严申门禁本意。著传知三旗护军营,严飭紫禁城内各门座及西苑门外值班之官员兵丁等,务须慎遵谕旨,敬谨守卫,不得仍蹈疏懈积习。并著三旗护军统领、司钥长等官,会同步军统领衙门派出官弁等,认真稽查,勿稍疏懈。其番役处仍著派出妥协官役,随时巡缉。勿得视为具文。特谕。此交。八月初九日。”(内务府《堂谕堂交》,光绪二十四年,包号171)

参见该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及该日“朱批折件事由单”(《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5/84)。

见,奉旨“明日递牌子”。而陈日翔、陈桂芳是新任礼部侍郎阔普通武保举的“通达时务人才”。

八月初六日、初七日两天的政令表明,慈禧太后虽开始对光绪帝、康有为进行清算,但尚在权力层面进行,而未进入政策层面。

(三)袁世凯告密消息传到北京

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做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判断,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发生,而告密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并开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表,即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向荣禄告密,荣禄的密折于初七日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初八日上奏慈禧太后,初九日逮问张荫桓等7人。黄先生称:“太后于初八日始见到荣禄密折,这自然还需要查北平故宫所藏军机处《早事档》、《随手档》,看是否相合。”为此,我查阅了军机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皆无荣禄或杨崇伊的奏折。但此并不能证明荣、杨没有密折,因为该折也有可能未经内奏事处而到达慈禧太后手中,或者根本没有奏折,用书信、口信的方式转达于慈禧太后。

黄先生的袁世凯告密而致使政变加剧的判断,为后来的许多研究先进所采用,但表述不同。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提出袁告密消息于初六日晚传京,初七日慈禧太后开始行动。其主要证据是引用《驿舍探幽录》:

初七日,仍随班朝见,太后在帘内,皇上在炕侧坐,太后令廖寿恒拟拿办康有为羽党谕旨。廖拟就,呈于皇上,皇上转呈太后阅毕,仍递交皇上。皇上持此旨目视军机诸臣,踌躇久之,始发下。

我在前面提过,《驿舍探幽录》是一部可信度不高的著作,此初七日

见八月初二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

《戊戌变法》第1册,第489页。

的情节当为编造。首先,张荫桓根本不能“随班朝见”,他不是军机大臣,当日早朝值班的衙门是工部、镶黄旗。张氏为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这一天没有特旨是不能朝见的。为此查军机处《早事》、《早事档》、宫中《召见单》,根本没有张荫桓召见的记录。其次,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未设帘,而是与光绪帝同坐。再次,我查阅了军机处所有记录谕旨的档册,当日并无此一内容的谕旨。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指出,逮捕新任四章京等人的时间为八月初九日,其主要证据为八月十一日崇礼的奏折:

初九日,该衙门(步军统领衙门)续奉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钦此。”经该衙门遵将官犯张荫桓等七名,悉数拿获,于初十日,一并解送到部。

为此,我查阅了军机处八月初八日、初九日《上谕档》、《交片档》、《交发档》、《交事》、《随手登记档》等有关记录谕旨的档册,发现的情况与初六日捉拿康有为的谕旨一样,根本没有记录。再查《实录》,注明该旨的材料来源仍是《东华录》!在修纂《实录》时,有关人员是很方便地利用军机处的各类档案的,可他们也已找不到有关记载,只能转引私修的《东华录》。而《东华录》的材料又来源于何处?我对此尚无证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崇礼八月十一日的奏折刊于《谕折汇存》。我以为,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东华录》的编者是从崇礼奏折中剥下八月初六日、八月初九日两旨,《实录》修纂官再从《东华录》中转引,其来源都是崇礼奏折。这可以说明,逮捕张荫桓等人的

很可能受《辵舍探幽录》的影响,房先生2000年论文称:“张荫桓为军机大臣,初八日逮捕他时竟无旨,初九日才有旨,这说明初八日的逮捕令是非常秘密的。”房先生的意思是,为了保密,初八日逮捕令未经军机处。就结论而言,房先生的看法有新意,但就过程而言,是将张荫桓的身份弄错了。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5页。

谕旨未经军机处,而是由慈禧太后直接下达给步军统领的。马忠文先生1999年论文证明,八月初八日晨杨锐、刘光第、谭嗣同被捕,林旭于初九日被捕。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何前引崇礼奏折称“初九日该衙门续奉上谕”?对此档案中没有材料可证。

我个人猜测,慈禧太后下达的逮捕张荫桓等人的谕旨,很可能不是一道,而是多道,即其人数一开始不是7人,而到了初九日最后达到7人。八月初十日,步军统领衙门上有一折,军机处《早事档》记录为:“步军统领衙门封奏一件。奉旨:留。”《随手登记档》记录为:“步军统领衙门折,拿获张荫桓等请交部由”。该折可能会记录有关谕旨的情况。由于该折尚未检出,也无法将之核对。

由此再看八月初八日的朝政。这一天是慈禧太后进行训政典礼的日子,其日程安排为:

八月初八日巳时,德昌门外设圣母皇太后仪驾,圣母皇太后在仪鸾殿办事、进早膳毕。午时,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仪鸾殿乘轿,出寿光门,由纯一斋出崇雅殿门,进仁曜门,至勤政殿东暖阁少坐,礼部堂官转传与内监,奏请随。总管一名奏请圣母皇太后升勤政殿宝座。礼部堂官引皇帝至拜褥上立,鸣赞官奏跪拜兴,皇上率领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总管一名引皇后率瑾妃步行至殿内拜褥上,诣圣母皇太后前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总管二名奏礼毕,圣母皇太后起座乘轿出仁曜门,进崇雅殿门,仍由纯一斋进寿光门,还仪鸾殿。由此可见慈禧太后的“办事”地点在仪鸾殿。又据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这一天召见的人员为选用道陈日翔、刑部主事陈桂芳和军机。这一天的诸多事务,很可能使慈禧太后一时还提不出一个完整的名单。在慈禧太后的的心中,此时最恨的人是康有为、张

荫桓,这一点当时并不是秘密。其次是未经其同意的新任四章京,八月初三日她已对其限权。至于徐致靖,很可能因其曾保康有为而对他有印象;至于杨深秀,虽属康党,但其被捕一事,很可能另有原因。如果真情有如我的猜测,前后有多道谕旨下达,而初九日的谕旨名单最全;我以为,崇礼八月十一日奏折仅引初九日谕旨,则是出于省文。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中提出,初九日的谕旨“主要目的不是捕人,而是令提督衙门将已经拿获的谋乱要犯移交刑部收监”,也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分析。

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指出,袁世凯告密消息传京后,“光绪帝的处境就恶化了”,从八月初八日起至十一日,慈禧太后“就不让光绪帝和她一起‘在便殿办事’了”。房先生的依据是宫中《穿戴档》,因为八月初八日起至十一日没有“见大人”的记录,而初九日、十一日没有换衣服。我以为,房先生的这一判断似为有误。

首先宫中《穿戴档》主要是记录皇帝的穿戴,如果没有换衣服,有些政务活动经常不记。为此,我核对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至八月初七日的《穿戴档》,其中有41天没有“见大人”的记载,而核对军机处《早事》,这些日子没有一天不见军机大臣的。因

八月初五日晚,林旭去见郑孝胥,称杨崇伊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要求“清君侧”。郑称:“此事急矣。康有为已去,张荫桓尚在,惟有逐之以息众谤,则或可免祸耳。”(《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

康有为、梁启超称,杨深秀在慈禧太后训政后上奏请撤帘,于是遇难。此说已被孔祥吉先生所驳。见《杨深秀考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288—290页。

《穿戴档》中未有“见大人”记载的日期为,四月初十日、十二日、十八日、二十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至三十日,五月初一日、初十日、十八日至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六月初四日至初七日、初十日至十二日、十七日至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七月初四日至初六日、初九日至十一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光绪帝如无特殊礼仪活动,每天只穿一套衣服是常见的事情,有时甚至连续几天都只穿一套衣服。

此,不能因《穿戴档》中没有“见大人”的记录,而判断光绪帝此日未见军机大臣。

其次,据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八月初八日召见陈日翔、陈桂芳和军机,初九日召见文焕、祁师曾、李稷勋和军机,初十日召见何乃莹、嵩恩、翁斌孙和军机,十一日只召见了军机。其中前已提及,陈日翔、陈桂芳、祁师曾是闽普通武保举的通达时务人员,李稷勋是陈兆文保举的通达时务人员,文焕是新任四川叙州府知府,何乃莹为新任奉天府府丞兼学政,嵩恩、翁斌孙皆是翰林,且翁斌孙还是翁同书的孙子。如果了解了这些人的背景,很难想像只是慈禧太后一人召见。若是如此,这些人员若见不到光绪帝,必会传出消息,而会引起无数猜测,引起政局的很大波澜。

再次,光绪帝的朱批权并未被剥夺。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的记录及档案中现存的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皆可为据。仅是朱批,不见军机,在工作程序上存在一些困难,慈禧太后还需要光绪帝出场。在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不管后来光绪帝的境遇如何,他的朱批权一直没有被取消,只不过这些朱批毫无内容,皆是“知道了”、“著照所请,该部知道”之类的空话。

尽管房德邻先生认为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光绪帝见军机之权

1999年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档时,该院研究员庄吉发先生提醒我,戊戌政变之后,现存的朱批奏折上仍是光绪帝的笔迹。现藏于北京和台北的光绪朝朱批奏折皆已出版,我翻看了一下,上面的朱批字样在政变前后完全一样,可以证明是光绪帝的笔迹。为此感谢庄先生的提醒。由此也可证明,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中称,政变之后的朱批是慈禧太后所为,朱谕也是慈禧太后所为的判断是不正确或不准确的。至于黄先生所提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袁世凯升授工部侍郎后袁所上谢恩折,袁给光绪的折子上有朱批‘无庸来见’四字,系太后笔迹,非光绪所写”,该件我还没有看见,还不能做出回答。

被慈禧太后所夺,其证据是不充分的,但房先生“光绪帝的处境就恶化了”的判断还是正确的。除了八月初八日起逮问谭嗣同等人外,慈禧太后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初九日,将原定初十日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改为十四日,这表明她有大量的事务需要处理,而且必须在城里,原定计划时间已经过紧。推迟的时间仅4天,又表明她还没有放弃在颐和园过中秋节的计划。初十日,发下谕旨:“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此一由内阁明发的谕旨,除了求医外,更重要的是诏告天下,光绪帝从“四月”起即处于病中,有关政策皆是在病中决定的。同日,她电令荣禄来京,决心重组中枢,用其亲信来控制军机处。同日,她还对原定八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在颐和园颐乐殿演戏事,也做出了调整:

敬事房传旨:初十日老佛爷驻蹕颐和园,改于十四日驻蹕颐和园。”奉旨:八月十四日四喜班、十五日福寿班、十六日宝胜和班颐乐殿侍候戏。敬事房传旨:十四日之戏,改十三日纯一斋伺候。十五日、十六日之戏颐乐殿伺候。十五日养心殿月供改紫光阁伺候。奉旨:十四日四喜班改十三日纯一斋伺

《内务府来文》中有两份文件:“八月初九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十日皇上驻蹕颐和园,今改为本月十四日驻蹕。所传出车辆、马匹、苏拉等俱于是日寅初在福华门外照例预备。于十七日还宫。所传车辆、马匹、苏拉等于是日在东宫门外照例预备。差首领何增盛传。”“八月初九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十日皇后、瑾妃住宿颐和园,今改为本月十四日住宿。”(《内务府来文 巡幸及行宫》,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至十二月)内务府《日记档》(署中)八月初九日记:“皇太后、皇后改十四日驻蹕颐和园记载、手折、粘单、行文灯交,均发公所讷。引导、跟随手折及报帖发公所讷。”(杂记类 243/日 243)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八月初九日记:“由敬事房传旨:于八月初十日老佛爷驻蹕颐和园,着改于十四日驻蹕。特记。”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

候。十五日福寿班、十六日宝胜和班颐乐殿伺候。

慈禧太后此时仍不忘看戏,似乎觉得一切已经处于她的重新控制之下。十一日,下旨恢复原被裁撤的詹事府等衙门,取消司员士民上书权,撤消时务官报,各州县小学堂由各地官员酌情办理。也就是说,慈禧太后此时不仅是权力上进行清算,而且在政策上进行了反攻。以上诸事件中,调医入京为光绪帝治病一事,最为各位研究先进所注重,认为是慈禧太后废帝的先声。为此,再作补正于下。

首先是光绪帝确实有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的内务府《记事珠》中,共有 15 条这样的记载:“适太医院报上皇上脉案一纸,已缮手折引文给怀堂发宅。原脉案粘档讫。”其中的“怀堂”当指内务府大臣怀塔布,当怀塔布被罢斥后,即改发为“启堂”,即内务府大臣启秀。而有此记载的时间为:七月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初六日、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十四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我还没有查到相关的档案,以看看这些脉案中究竟有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如此频繁的脉案上报是出于病情还是例行公事,但一个健康的皇帝不应当出现

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八月初十日。此记载相当混乱,其原因是升平署人员此时尚在颐和园,有关旨意传到时间晚了一天。但可以看出,慈禧太后是匆匆做出决定的。其中“四喜班”、“福寿班”、“宝胜和班”皆是外请的戏班子;“纯一斋”在西苑;“月供”是中秋节的仪式,由养心殿改为紫光阁,说明光绪帝中秋节那一天不可能回宫,仍将在西苑。

内务府档案中对此有记录:“总管内务府谨奏。为奏闻请旨事。礼部尚书怀塔布奉旨革职,其所管处所应请派员管理。谨将怀塔布佩带内务府印钥并所管处所及臣等衙名分缮清单,恭候简派。”七月二十二日具奏,奉朱笔圈出,启(秀)佩带印钥,管理御药房、太医院、紫禁城值年,崇(光)管理宁寿宫、上驷院,文(琳)管理圆明园,世(续)管理造办处。其醇亲王载沣家务,著勿庸管理。钦此。”(《内务府奏案》,光绪二十四年一月至七月,446/5—55/W/第710包)其中“佩带印钥”为总管内务府首席大臣之责,御药房和太医院改由启秀负责。

内务府《记事珠》,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杂记类 242/日 242。

如此之多的脉案并上报内务府大臣。光绪帝当然不是患重病,他的病情我在后面还会具体地加以说明。

其次是调医入京的电旨,当时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山东巡抚张汝梅,十一日推荐了山西汾州的朱焜。其次是两广总督谭钟麟,十一日推荐了惠州府卢秉政。再次是在上海的盛宣怀,十二日推荐了青浦人陈秉钧。^①当时富有政治经验的封疆大吏,从调医入京的电旨中看出了名堂。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十四日电称:“惟查湖北省良医素少,是以之洞十年以来遇有病疾,皆只自行调理,不敢延医服药。目前实无精通医理之人,不敢冒昧保荐,容各方访闻,如得其人,即奏明驰送赴京。”陕西巡抚魏光燾十四日电称:“陕西现乏良医,仍留心访查保送。”两江总督刘坤一更是滑头,他于十七日电称:“前奉电传谕旨,飭令保荐医士。皇上圣躬欠安,莫名企念,当经详加延访,查有在籍郎中陈秉钧医理精通,堪膺保荐。电飭苏松太道蔡钧迅速派人敦劝应召。昨据复称,该郎中料理行装,准于二十四日到沪赴京等因。正在电奏间,准苏抚电知,该郎中业经盛宣怀奏保,奉旨迅速来京等因。除飭蔡钧传知该郎中迅速航海北上外,谨先电陈,并跪请圣躬万安。”他可能听到盛宣怀已荐陈秉钧,如再称江苏省无良医,便无法交待过去,结果也荐陈秉钧。安徽巡抚邓华熙对此的电报,颇见政治技巧,他于

① 张电称:“本日恭奉电传上谕:……汝梅查,山东现无良医。惟在山西臬司任内,知有汾州府张兰镇同知朱焜医学可靠,脉理分明。可否电令山西巡抚即飭朱焜赴京之处,乞代奏请旨。汝梅谨肃。真。”十二日电旨山西巡抚胡聘之,命朱焜前往军机处报到。谭电称:“钦遵电旨,查前任惠州府卢秉政颇谙医理,即日给咨,航海晋京诣钧署候旨。祈代奏。钟麟。真。”该电十三日总理衙门收到。盛电称:“江苏名医在籍郎中陈秉钧,青浦县人,医理精通。每遇标本要证,举重若轻。现系江南第一手。可否请电飭江苏巡抚传旨驰送,数日可到。乞代奏。宣怀。文。”次日电旨江苏巡抚奎俊,命陈秉和前往军机处报到(见《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十三日)。

十八日电称：“承准贵署初十日电上谕，饬荐精通医理之人，即日驰送来京等因。钦此。圣躬不豫，臣下企念万分，亟应钦遵举荐。华熙素所深知江苏医士马培之精通医理，著有明效，堪膺保送。访查该医士寄居无锡县，电饬该县劝驾。兹据电称，该医士年已八旬，步履跪拜艰难请辞等语。年高既难勉从，此外亦难其选。谨祈鉴察。”其意是我已尽心，但事未办成，由此了却此一棘手的皇差。最后做出反应的是新任广州将军寿荫，刚从热河都统调任，电报晚了一些，九月十一日电奏推荐了门定鳌。卢秉政、朱焜、陈秉钧、门定鳌后来都成为光绪帝医疗班子的重要成员。除此之外，我还没有发现其他电报，看来众多的封疆大吏一反以往热衷于皇差以显示其忠心，在此关键时刻对此类皇差存有很大的戒心，干脆不表态。

(四) 光绪帝不认可“围园劫后”说

八月初十日，康广仁、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8人转到刑部监狱。十一日，崇礼等刑部六堂官上奏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当日发下谕旨，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对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严行审讯”；对张荫桓“著交刑部看管，听候谕旨”；并表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不再扩大范围。十二日，又发下交片谕旨，增派御前大臣参加审讯，并“限三日具奏”。十三日，发下谕旨，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即行处斩”，派刚毅监刑，崇礼带兵弹压。十四日，发下谕旨，张荫桓发往

张之洞、魏光燾、刘坤一、邓华熙电，均见《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军机处《各衙门文书》光绪二十四年记：“九月十一日，总理衙门为广州将军保荐医生门定鳌事。”（《军机处汉文档案册》，第2278号）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军机处《上谕档》、《交片档》。

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徐致靖“永远监禁”,其子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八月十一日崇礼奏折中所引初九日谕旨中的7人名单顺序为张、徐、杨(深秀)、杨、林、谭、刘,当日谕旨中的名单仍相同,只不过去掉了张,增加了康;十三日谕旨名单顺序已稍有变化,康、杨(深秀)、谭、林、杨、刘。谭嗣同与杨锐位置正好互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尽管我还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样的内情。

慈禧太后不审而诛六君子及将张荫桓发往新疆的原委,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已经有了完整的评述,称此为英、日干涉的结果,对此我是同意的。然而,六君子不审而诛,留下了许多疑问,其中最重要的是康有为等人“围园劫后”的密谋。杨天石先生1985年论文、赵立人先生1990年论文都认为康有为等人有主动的武装夺权的密谋,对此最重要的证据是八月十四日“内阁奉朱谕”中的一段话:

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

“朱谕”中的这段话,不可能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对照已被杨天石先生等人认定为大体可信的袁世凯《戊戌日记》,此中的“乱党”,当属谭嗣同所称的“好汉数十人”、“湖南好将数人”;“谋围颐和园”,即为谭嗣同谋请袁世凯带兵围攻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即为谭嗣同所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这一段话是袁世凯告密的铁证。

袁世凯的告密,使慈禧太后有了“围园劫后”的说法,然此事牵涉到光绪帝,光绪帝对“围园劫后”说又是什么态度呢?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指出,此朱谕非出自光绪帝,而是由军机起草,慈禧太后抄录的,但他对此既无证据也无论证。然从档案来看,黄先生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该段文字在《实录》中为“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

的这一大胆判断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查八月十四日军机处《上谕档》，有一段很奇怪的记载：

康有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

杨深秀等实系结党，谋为不轨

每于召见时，杨锐等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

因时事紧迫，未俟复奏。又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细思该犯等自知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有株连。是以将该犯等即行正法。又闻该乱党等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

这一件记载上有“朱”字，可见是出光绪帝朱笔书写。再查该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同样也有一条很奇怪的记载：

发下朱谕一件 康有为 见面带下 随事缴进

其中“康有为”3字较小，“见面带下”“随事缴进”8字，字体更小。这两处记载当属一事。由此可以看出，军机章京收到光绪帝发下的朱谕一件，“康有为”3字，是该朱谕的首3字，即其内容。“见面带下”，是指军机大臣召见后带下，军机章京得此而抄录，“随事缴进”，是指该朱笔随“事”一起由军机大臣缴回。清代制度，朱笔必须缴回。

八月十三日不审而诛六君子，是对清朝审拟定罪一整套制度的极大破坏，也违背了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之谕旨。八月十四日的朱谕，是对这一违制举措的解释。很可能光绪帝奉慈禧太后之命，拟一道朱谕以平息舆论。其中“因时势紧迫，未俟复奏”一语中，“时势”当指英、日两国在张荫桓被捕后所施加的压力，“复奏”

清朝以往惩办朝廷要犯，皆依其法律制度审判行事。即便是最为峻烈的雍正帝，也经过三法司审理勾决。

当指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与刑部、都察院审讯定拟的复奏。“又有入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一语，当指八月十一日高燮曾、庆绵、张仲炘、胡孚辰、徐道焜、冯锡仁、穆腾额的联名上奏，八月十二日黄桂鋆1折2片，八月十三日贻谷的奏折，“中变”即外国干涉之事。但光绪帝此时的思绪相当混乱，无明确的思路，苦思冥想，罗掘罪名，只做出这一无头无尾，语多零乱的朱笔，且也无法再写下去，于是由光绪帝或慈禧太后下发军机处，命其拟旨。根据光绪帝的朱笔，军机们拟出了洋洋一大篇谕旨。这一判断自是推测，但当日由内阁明发的“朱谕”，几乎全部包括了光绪帝的朱笔，可以作为内证。^① 下引其全文，并将录自朱笔处用黑体标出：

内阁奉朱谕：近因时劳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

① “内阁奉朱谕”是当时很少使用的谕旨形式，以示其特别重要。有时谕旨虽是皇帝亲写，仍用“内阁奉上谕”，而不标明“朱谕”。如慈禧训政的谕旨，军机处《上谕档》中标明“朱笔”，即为光绪帝亲写，但发布时仍称“内阁奉上谕”。光绪二十四年以“内阁奉朱谕”形式发出的谕旨，就我所见，共4道。第一道为四月二十七日罢免翁同龢，第二道为七月十九日罢免礼部六堂官。这两道谕旨，军机处《上谕档》皆抄有“朱笔”谕旨，然后再写“内阁奉朱谕”的谕旨，两者相较，只是开头加“内阁奉朱谕”五字，结尾加“钦此”两字。由此可见，若用“内阁奉朱谕”，军机处《上谕档》应抄有两道同样内容的谕旨，即先抄下“朱笔”谕旨，再抄下“内阁奉朱谕”。第三次即为此次公布被处决的康广仁等罪名。八月十四日“朱笔”如此之简，而后的“朱谕”如此之长，已可证其非光绪帝所亲拟，而出自军机之手。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于十月二十一日，军机处《上谕档》中记：“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至甲午年蛊惑开衅，以致国势垂危，不可收拾。今春又密保康有为。种种劣迹，不可枚举。至入枢廷以来，办理诸事又多乖谬。前因任性跋扈，开缺回籍，继思前事，殊深痛恨。著即行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吴大澂贻误军情，声名恶劣，居心不端，著革职。”该件上有“朱”字，当为光绪帝之朱笔。结果由军机处对此做出一篇大文章，且有很多内容违背了光绪帝的朱笔。如“今春又密保康有为”一语，变为“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道。”此外，朱笔中“蛊惑开衅”一语也完全变了意思。

强。凡所施行,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来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纲,倘若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鹰鸇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

从对比中可见,朱笔中只有“因时势紧迫”一语,在朱谕中没有出现。绝大多数罪名,皆出于朱笔,军机们只是加以引申或放大,也有一些内容引自八月十一日的两道谕旨,惟一的例外是“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一节,光绪帝根本没有提到这一内容。也就是说,对“围园劫后”说光绪帝未予认可。以上的内容,可为房德邻先生1988年论文做一补证。

由军机所拟的这道朱谕,最后由光绪帝抄写、或由慈禧太后抄写、或两人根本未抄,在档案中还查不出结论来,但可以肯定,此一道由军机所拟的“朱谕”,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

综上所述,可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八月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形势急变。先是慈禧太后决定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后又直接训政。这两项决定与袁世凯告密似无关联,但袁告密消息传京后,引发了一系列的震动,尽管光绪帝不认可“围园劫后”的密谋。如果从政治权力关系而言,光绪帝虽有权见军机,但只是陪衬,仍旧作朱批,但只是传统政治中的那些套话;而在名份上,他还是皇帝。

〔作者茅海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谢维】

八月十一日两道明发上谕中称:“朝廷振兴庶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益时政而有碍治体,均无庸置议。”方今时势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此外难保官绅中无被其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至意。”(见该日《上谕档》)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New Policies were carried out in Tibet amid increased aggression by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while the Qing government faced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in governing Tibet.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New Policies in late Qing Tibet were: politically, adjusting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cleaning up local administration; economically, developi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militarily, training New Army units and strengthening armament; culturally, building schools and developing newspapers. After the New Policies were carried out,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handled affairs more efficiently,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mines, communications and posts improved, a modern army was developed, and modern culture was spread. The Qing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its rule over Tibet, and safeguarded Tibet's sovereignty. All these results helped to defend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However, interference and disruption by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corrup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incompatibilities between some New Policies measures and Tibetan realities finally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New Policies in Tibet.

The Timing, Process and Details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Understanding, Correcting, and Improving on Past Interpretations() *Mao Haijian* (135)

Using materials in the China No. 1 Historical Archive, and referencing archives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 Taipei and the Diplomatic Archive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this article subjects the various views of past research to scholarly examin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and makes improvements and corrections accordingly. With a great deal of historical data, this paper details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provides authors own ideas about past interpretations.

Re-reading the *Autobiography of Li Xiucheng*
 *Jiang Tao* (193)

Catalog of Publication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2001
 (208)

English abstracts translated by Du Jidong and edited by Alexander Beels